

分类号:

密级:

U D C :

学号: 405001410173

南昌大学统招硕士研究生
学位论文

佛教、教化与郊游胜地：
10—18世纪通天岩与赣南地域社会
Buddhism Enlightenment and Picnic paradise :
Tongtianyan and Gannan Region Society from 10th Century to 18th Century

杨 新

培养单位（院、系）：人文学院历史系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黄志繁 教授

申请学位的学科门类：历史学

学科专业名称：中国古代史

论文答辩日期：2013年 月 日

答辩委员会主席：黄繁

评阅人：

2013年5月7日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南昌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手写）： 签字日期：2013 年 6 月 5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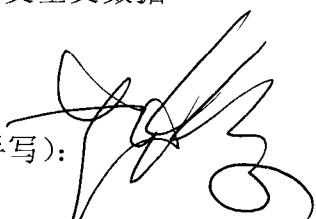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南昌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南昌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本学位论文。同时授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和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将本学位论文收录到《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全文发表，并通过网络向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手写）：

签字日期：2013 年 6 月 5 日

导师签名（手写）：

签字日期：2013 年 6 月 5 日

摘要

赣南地区自古被称为“化外之地”，历经宋、明不间断的开发，直至清代才转变为“化内之地”。儒教与佛教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宋代是赣南地区开发初期，此时的佛教也已中国化，臣服于统治者。而佛教的教义具有教化功能，因此，佛教在赣南地区的传播有助于教化当地士绅民众，维护社会秩序。作为赣南地区的佛教胜地，通天岩自然扮演着“教化”的象征意义。同时，通天岩作为宋代著名隐士阳孝本隐居之地和成为士大夫们郊游胜地的事实，表明佛教与士绅宣扬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和谐共处的空间。

明代赣南地区继续发展，尤其是在明中叶王阳明任南赣巡抚期间，平叛乱，兴教化，赣南地区弦歌不辍、民心向化。作为王阳明在赣南重要讲学之地的通天岩，继续发挥着儒学赋予它的“教化”象征意义。

清代赣南已逐渐从完成了从“化外之地”向“化内之地”的转变，通天岩也回归其原本的角色，成为赣州的郊游胜地。

通天岩的教化宣示色彩逐渐褪去，回归为赣州郊游胜地的事实表明，名山胜地在地方早期社会可以成为“教化”的象征，但随着教化的逐渐推广，区域社会逐渐被纳入王朝的统治范围，它们在区域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会发生变化。

关键词：通天岩；赣南；佛教；教化

ABSTRACT

Gannan since the ancient times referred to as "Land of heathen", after the Song, Ming continuous development until the Qing Dynasty into the" Culture place".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is process of change.

Early is ganan development in the Song dynasty. Buddhism in China at this time and surrender to the rulers.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Buddhist teachings, therefore, the spread of Buddhism in the southern jiangxi province helps local gentry of corrections population, the maintenance of social order. As the gannan Buddhist attraction. Tongtianyan natural play "indoctrination" symbolism. At the same time, Tongtianyan as a famous hermit Yang Xiaoben retire and become scholar-officials in the Song dynasty picnic resort facts, indicating that Buddhism and gentry to promot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the culture of space.

Gannan continued to develop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especially during the Middle Ming Wang Yangming's southern Jiangxi Province Governor, rebellion, diversion, gannan carried on without interruption, and the people. As the Tongtianyan of Wang Yang-Ming's important lectures in gannan, continued to play the give Confucianism "indoctrination" symbolism.

Gannan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the Qing dynasty went from "Land of heathen " to " Culture place " change in Tongtianyan is also returning to its original role, Ganzhou outing destination.

Tongtianyan education declared color fade gradually, return to Ganzhou outing destination shown to mountain resorts in the early society could become "indoctrination" symbol, but with the gradual promotion of education, regional community were gradually into the scope of dynasty's rule, they play in the regional social roles also vary.

Key words: Tongtianyan; Ganan; Buddhism; Enlightenment

目 录

第1章 导言.....	1
1.1 选题目的及意义.....	1
1.2 文献综述.....	2
第2章 佛教胜地的象征意义：宋代通天岩与赣南社会.....	5
2.1 佛教与宋代赣州地方社会.....	5
2.1.1 宋代赣州佛教概况	5
2.1.2 宋代赣州佛教特点	7
2.2 成为佛教胜地：宋代通天岩的开发	11
2.2.1 通天岩石窟的建造及其原因.....	11
2.2.2 佛教胜地的形成.....	14
2.3 成为士大夫郊游胜地：宋代通天岩在地方社会的意义	16
第3章 从阳孝本到王阳明：儒学与通天岩的教化意义.....	19
3.1 阳孝本与通天岩	19
3.2 王阳明讲学活动对通天岩的影响	24
3.3 教化与象征：宋代通天岩摩崖题刻与王阳明通天岩讲学活动分析 ..	29
第4章 回归本位：清代通天岩角色的转变.....	36
4.1 清代赣南社会的变化	36
4.1.1 清代赣南经济社会的变化	36
4.1.2 清代政府在赣南地区统治的深化.....	39
4.2 角色转变：郊游胜地	41
第5章 结语.....	46
致 谢.....	47
参考文献.....	48

第1章 导言

1.1 选题目的及意义

通天岩位于赣州城区西北郊 10 公里处，是一著名的风景名胜。这里发育着典型的丹霞地貌，岩谷深邃，丹崖绝壁，因“石峰环列如屏，巅有一窍通天”而得名。通天岩上现存有唐宋时期石窟佛龛 315 处，共计造像 359 尊，为江南地区所罕见。除此之外，通天岩石窟至今仍然保留着自北宋以降历代的摩崖题刻 128 品，堪称江西艺术之冠，更于 1989 年被国务院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宋代以前的通天岩名声不显，人文活动相对较少。但宋以降，大量石窟佛龛的建造，阳孝本的隐居，大量儒家士大夫的光顾，使得通天岩的人文活动增多，逐渐闻名于世。

宋代，佛教世俗化的趋势明显，士绅民众崇信者众多。通天岩因石窟佛龛的大量建造，士绅民众的常常来此求神拜佛，佛教气息日益浓厚，逐渐成为赣南的佛教胜地。同时，北宋著名儒家隐士阳孝本隐居于此二十余载，因其德高行先，知识渊博，吸引士人前去拜谒并留下诗刻，如时任神宗朝尚书左丞的蒲宗孟；途径赣州，专程拜访阳孝本，并与之结下深厚情谊的苏轼。浓厚的佛教气息，以及阳孝本的故事，吸引着众多士大夫前往通天岩揽胜赋诗，因而通天岩逐渐成为来往于赣南或赣南本地的宋代士大夫们的郊游胜地。

明代通天岩上的石窟佛龛建造已无踪影，佛教活动减少，佛教气息也未有前代那么浓厚，取而代之的则是浓重的儒家文化气息。明中叶，王阳明巡抚南赣期间，不仅与友人、弟子遍游通天岩，且在通天岩结庐讲学，为其弟子讲授心学。江西讲学之风盛行，王学也在江西迅速传播并波及天下，影响深远。通天岩上至今仍留存着王阳明及其弟子在通天岩上所做诗刻。阳明以后的明代士大夫常来通天岩缅怀先贤，赋诗留刻，感受阳明余韵。他们的到来为通天岩增添了浓厚的儒家文化气息，使得通天岩隐隐成为赣南儒学的象征。

清代的通天岩，已然没有了宋明时期所蕴含的宣扬教化的象征意味了。来往于此的士绅民众，大多是凭吊先贤，赋诗揽胜，将其当做一处休闲娱乐、放松心情的郊游胜地了。

作为江西的一处名山，通天岩在不同的时代以及社会背景之下蕴含着不同的象征意味，起着不同的功用。因此，笔者在前辈们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背景，地方社会环境，尝试还原 10—18 世纪赣南地域的社会变迁的过程，从而阐述名山大川在地方社会演变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文选择 10—18 世纪的通天岩作为研究对象，主要由于 10—18 世纪是通天岩活动最为频繁的时期，也是赣南地域社会从“化外之地”向“化内之地”的转变时期。通天岩上面的各种人文活动不仅赋予了通天岩在不同时代扮演不同角色，而角色的不同，又反过来影响赣南地方社会。从通天岩与赣南地方社会的互动中，我们就不难发现通天岩在赣南地域社会变迁中所起的作用，更能看出名山大川在地方社会演变中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起着重要的作用。

1.2 文献综述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 10—18 世纪的通天岩与赣南地域社会，属于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范畴。在进入正文前，有必要对已有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对于此类问题的研究回顾，本文主要涉及赣南地域社会的变迁、宋明儒学对赣南地方社会的作用及影响等领域。

一、唐宋以后赣南地域社会的变迁

随着由于区域史研究的深入，关于赣南地域社会的研究著述颇多，学界通常从社会史的角度，以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作为指导，运用历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在这一方面当数黄志繁教授和饶新伟教授的研究。黄志繁教授在其著作《‘贼’‘民’之间：12—18 世纪赣南地域社会》中，以生态环境的变迁、文明教化的展开、社会动乱的频繁以及族群的冲突为主要线索，在北宋到清初这一长时段中，通过对赣南地方社会从地方官和文人眼中的“盗薮”之地转变为“文物衣冠”之邦这一历史过程的论述，分析并思考了地方动乱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①

^①黄志繁：《“贼”“民”之间：12—18 世纪赣南地域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6 年。

饶伟新教授在《生态、族群与阶级——赣南土地革命的历史背景分析》中，将明清时期赣南地区的生态、族群和阶级结构融入赣南土地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中，并对此作了详细的介绍和分析。而在他的另一篇文章《明代赣南的移民运动及其分布特征》中，饶伟新以详尽的史料为基础，从明代赣南地区移民的具体来源、方式与分布特征等方面着重论述，以此廓清清代赣南客家社会的早期历史。《明清时期华南地区乡村聚落的宗族化与军事化——以赣南乡村围寨为中心》一文中，饶伟新以详尽、丰富的史料，描述了赣南乡民构筑大量具有军事防卫用途的乡村围寨的历史过程，并且指出，乡族武装力量的崛起，使其逐渐由松散的自保地方武装组织转变成保护乡村社会的主要武装力量，从而使我们清楚的认识到赣南乡村“聚族而居”现象出现的深刻的社会原因。^①

吴启琳博士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传承与嬗变：明清赣南地方政治秩序与基层行政之演化》中，详细介绍了明清时期南赣地方政治秩序及基层行政的演变过程，并分析了演变的原因与存在的规律。正因为他的介绍和分析，不仅使我们能够比较清晰的了解明清时期赣南地方行政与基层行政的演变过程及空间差异，而且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上，重新认识明清地方行政与地理环境、社会变迁的关系。^②

李晓方博士对于赣闽粤地区的客家颇有研究，尤其注意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所进行的互动。他认为，赣南地区尖锐的人地矛盾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明清时期大量的闽粤流民倒迁入赣南，同时由于新的经济方式随着流民带入赣南，虽然促进了赣南地区的开发和发展，但也给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和破坏，致使赣南地区的生态环境较前代更加恶化了。在此背景之下，士绅民众对环境保护有了一定的认知，与此同时，政府也逐渐重视生态环境的恶化，并采取了一些措施予以保护。赣南民众普遍崇信风水，且当时会匪猖獗，李晓方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通过大量的史料与分析，详细阐述了“国家”对控制赣南地区所采取的措施，作出的巨大努力。^③

二、宋明儒学对赣南地方社会的作用及影响

^①参看饶伟新：《生态、族群与阶级——赣南土地革命的历史背景分析》（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明代赣南的移民运动及其分布特征》（载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明清时期华南地区乡村聚落的宗族化与军事化——以赣南乡村围寨为中心》（载于《史学月刊》，2003年第12期）。

^②吴启琳：《传承与嬗变：明清赣南地方政治秩序与基层行政之演化》，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③参看李晓方：《明清时期闽粤客家的倒迁与赣南生态环境的控制》（载于《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明清时期闽粤客家的倒迁与政府控制》（与温小兴合著，载于《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清中叶赣南的会匪问题与政府控制——以<清实录>为考察中心》（载于《史林》2008年第4期）。

谢重光教授在其系列论文中，不仅论述了宋明理学在客家地区的传播，而且分析了宋明理学对赣闽粤边区地方社会的作用及影响。他认为，周敦颐与程颢、程颐在赣南地区的活动对理学的创立具有奠基的作用。明中叶王阳明任南赣巡抚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不仅安定了湘赣闽粤边区社会，而且促使阳明心学在江西迅速传播并波及天下，从而出现了陆王心学在客家地区与程朱理学并驾齐驱的局面。王阳明担任南赣巡抚期间，对“盗”、“贼”以及“流寇”采取剿抚并用，攻心为上的策略，同时，由于阳明心学在赣南地方所起的教化作用，使这些顽民走向良民的过程比较顺利自然。除此之外，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在讨论王阳明巡抚南赣对畲民进行汉化的过程时，也谈到了宋明理学对赣闽粤边区客家妇女的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①

陈进国在《理性的驱驰与义利的兼容——宋明理学与东南家族社会经济变迁简论》一文中，以社会史的视角，通过论述理学对东南家族制度的形成与完善起着重要的作用；分析得出，随着理学宗法伦理观念的庶民化及其文化规范的程序化与可操作化，东南的家族社会在不自觉中运用理学的文化象征资源，并将之内化为一种非纯粹功利主义的经济伦理精神，从而指导家族成员的工商业实践，反映了理学在家族文化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②

邹春生博士在《王化和儒化：9—18世纪赣闽粤边区的社会变迁和客家族群文化的形成》一文中，分析了宋明理学赣闽粤边区传播的文化史背景，通过对兴办学校、推行旌表制度以及控制宗教信仰三个事例的论述，着重介绍了中央政权在赣闽粤边区大力推行儒家文化并取得良好效果，认为儒家文化的大力推行，对该地区的社会变迁以及客家族群文化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也就说明中央政府在赣闽粤边区推行“王化”的过程中，也在大力推行“儒化”运动。^③

程鹏飞在《王阳明“知行合一”与〈南赣乡约〉》一文中，在解释和分析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基础上，以“知行合一”为理论指导，分析了王阳明颁

^①参看谢重光：《宋明理学在客家地区的传播》（载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新民向化——王阳明巡抚南赣对畲民汉化的推动》（载于《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宋明理学影响下客家妇女生活的演变》（载于《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5期）。

^②陈进国：《理性的驱驰与义利的兼容——宋明理学与东南家族社会经济变迁简论》，《东南学术》，2001年第6期。

^③邹春生：《王化和儒化：9—18世纪赣闽粤边区的社会变迁和客家族群文化的形成》，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布《南赣乡约》以后，南赣地方社会的转变，认为王阳明在南赣实行的乡约模式对当时及以后地方社会的治理与稳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①

总的来说，赣南地区作为区域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地方，学者研究著述颇多，研究范围颇广。然而，通过论述名山大川在宋至清地方社会中扮演角色的不同，分析名山大川在地方社会的变迁中所起到的作用，关于这一类的研究较少。因而通过对赣州通天岩与赣南地域社会变迁的互动的研究，揭示通天岩在赣南地域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待学界的努力，这也是本文选题的意义所在。

^①程鹏飞：《王阳明“知行合一”与<南赣乡约>》，《贵州文史从刊》，2000年第3期。

第2章 佛教胜地的象征意义：宋代通天岩与赣南社会

宋代通天岩既是赣南佛教胜地，又是士大夫的郊游胜地，这一事实不仅表明通天岩与赣南地方社会之间互动频繁，通天岩对赣南地方社会影响之大，更说明了佛教与士绅宣扬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和谐共处的空间。

2.1 佛教与宋代赣州地方社会

2.1.1 宋代赣州佛教概况

宋代之前赣州的佛教发展概况，我们可以从诸多版本的地方志的记载中窥见一二。佛教传入赣州的具体时间由于资料缺乏，无从考证，但据嘉靖版、天启版、同治版《赣州府志》以及清光绪年间的《江西通志》记载，唐代是赣州佛教的大繁荣大发展时期，建寺之风异常兴盛。据笔者对这三种版本的《赣州府志》以及光绪年间的《江西通志》统计，唐朝有记载的佛寺共有 52 座。^①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位于龚公山的宝华寺。唐开元年间（713-741），马祖道一禅师来赣，结茅于赣县龚公山（今宝华寺）。据王国荣在《马祖道一传法活动考论》一文中所述，无等禅师、怀海、自在、齐安等名僧，都是在这一时期投龚公山皈依马祖道一的。据此可知，龚公山“清净梵场”有相当的规模了。^②

宋太祖建立北宋后，对于佛教采取扶持与限制并举的政策。乾德四年（966）四月，河南府进士李蔼因不信佛教并写文章排佛被流放，“河南府进士李蔼，决杖，配沙门岛。蔼不信释氏，曾著书数千言，自号《灭邪集》，又辑佛书缀为衾綢，为僧所诉。”^③可见此时宋太祖赵匡胤对佛教持扶持的态度。宋太祖并不是一味的扶持佛教，对其又有一定的限制，“先是，诸道铜铸佛像，悉辇赴京毁之。丁酉，诏勿复毁，仍令所在存奉，但勿更铸。”^④这不仅保证了佛教能够继续存

^①参看：（明）董天赐：《赣州府志》卷之十二《外志·寺观》，嘉靖十五年本；（明）余文龙、谢绍等纂修：《赣州府志》卷之十四《寺观》，天启元年修，清顺治十七年重刻本；（清）魏瀛等修，钟音鸿等纂：《赣州府志》卷十六《寺观》，同治十二年刊本；《江西通志》卷一百十三《寺观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王国荣：《马祖道一传法活动考论》，成都，《宗教学研究》，2006 年第 02 期。

^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M]，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第 169 页。

^④（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M]，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第 195 页。

在的物质条件，而且又限制了它的发展。

宋太祖对佛教的这种态度，究其原因，正如郭朋所说：“只有佛教，才有可能给灾难深重的广大劳动群众以‘精神慰藉’，把劳动群众的愁思，从苦难的现实，引向虚无缥缈的‘无有众苦，但受诸乐’的彼岸世界，从而使此岸的苦难世界能够保持表面的平静，宋王朝的封建统治也因此能够得到短暂的维持。”^①

有宋一代，除却宋徽宗因崇信道教而一度废佛之外，其余宋代统治者对于佛教基本上是继承了宋太祖的态度。在此背景之下，宋代赣州佛教虽继续发展，但发展的力度显然不能与唐代相比。在三种版本的《赣州府志》以及光绪年间的《江西通志》中有记载的两宋时期兴建的佛教寺院只有39座，略少于唐代的52座。^②

虽然宋代佛教发展力度与唐代有所相差，但在社会影响力方面却不是前代所能相媲美的。陈寅恪先生曾就此说过：“自宋以后，佛教已入中国人之骨髓，不能脱离”。^③赣州亦不例外，佛教对士绅民众影响颇大。在赣州市郊的通天岩上，至今仍保留着许多佛龛石刻，从这些石刻中我们能发现：宋代许多士绅民众于通天岩上捐建佛龛造像。在嘉靖版《赣州府志》中曾记载：其作工巧，好佛信鬼。^④这一则材料说明了赣州地区信佛传统由来已久，且深入人心。

虽然宋代赣南地区佛寺兴建数量略少于唐代，但兴建的佛寺分布却更为广泛广泛，几乎每个县都有寺院建设。具体如表2.1所示：

表2.1 宋代赣州兴建佛寺分布表

府域	县域	寺数	县域	寺数	县域	寺数	总计
赣州	赣县	5	于都	0	信丰	4	24
	兴国	2	会昌	1	安远	11	
	龙南	1					
	石城	4	宁都	0	瑞金	1	
南安军	大余	10	南康	2	上犹	3	15

注：赣州府的长宁、定南，南康府的崇义皆为明代设置，故不将此三县列入统计之中。

资料来源：明嘉靖《赣州府志》卷12《外志·寺观》；明天启《赣州府志》卷14《寺

^①郭朋：《中国佛教思想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页。

^②参看：（明）董天赐：《赣州府志》卷之十二《外志·寺观》，嘉靖十五年本；（明）余文龙、谢绍等纂修：《赣州府志》卷之十四《寺观》，天启元年修，清顺治十七年重刻本；（清）魏瀛等修，钟音鸿等纂：《赣州府志》卷十六《寺观》，同治十二年刊本；《江西通志》卷一百十三《寺观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2页。

^④《后汉地理志》转引自（明）董天赐：《赣州府志》卷之一《地理·风俗》，嘉靖十五年本。

观》；清光绪《江西通志》卷121—125《寺观》、清同治十二年《赣州府志》卷16《寺观》、清同治《南安府志（八）》卷7《寺观》、清光绪《崇义县志》卷3《寺观》。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除却赣州府的于都、长宁之外，其余各县在宋代皆有佛寺兴建，其中尤以赣州府的安远和南康府的大庾最多，分别为11座和10座，其他县域大多为2、3座。除此之外，许多唐代及以前的寺院在宋代或重修、或扩建、或改名。位于赣县的慈云寺，兴建于唐，宋僧修惠重建；^①隋开皇五年（585）兴建于大庾的嘉佑禅寺，唐景云间（710—711）重修改名大云寺，宋大中祥符（1008—1016）初复兴庭植双桂四时开花，有丹泉味重而冽，改名清泉后改今名。^②唐开元年间（713—741），僧应珠于会昌修建的六祖寺，在宋淳熙（1174—1189）中被僧空谷重修并易今名。

除了佛寺的兴建，佛教摩崖雕塑艺术也在宋代赣州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位于今赣州城区10公里处的通天岩石窟便是典型代表。通天岩石窟现存有唐宋时期的窟龛315处，共计造像359尊。^③唐代末年是其初创时期，通天岩上面的佛教造像以雕造菩萨像为主，到两宋，尤其是北宋时期，通天岩佛教石窟雕塑艺术发展到顶峰，不仅造像数量众多，而且以雕造罗汉像为主。通天岩石窟不仅是我国地理位置最南端的一处石窟寺，也是我国江南地区最大的一处石窟寺。

2.1.2 宋代赣州佛教特点

五代，江西先属杨吴，后属南唐。统治者均能注重社会的安定与经济的发展，且大多信奉佛教，兴建寺庙之举不绝，为宋代佛教的勃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入宋以后，江西成为佛教弘扬传播的要地。禅宗“五家七宗”、净土宗、律宗、华严宗等诸宗在赣传承不断，名僧辈出，寺庙星罗棋布，僧尼众多。

赣州虽处于江西南部偏远地区，山岭遍布，经济不比赣北，但受到江西佛教兴盛之风的影响，佛教在宋代赣州不仅在前代基础之上继续发展，而且广泛传播，并带动了佛教文化的繁荣昌盛，促进了赣州社会文化的发展。考察宋代赣州佛教，笔者认为有着如下几个特色：

一 佛寺众多 分布广泛

^①（清）魏瀛等修，钟音鸿等纂：《赣州府志》卷十六《寺观》，同治十二年刊本。

^②（清）陈荫昌等修，石景芬等纂：《大庾县志》卷之三《建置》，同治十三年刊本。

^③赣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丹崖悠悠：赣州市通天岩摩崖石刻集锦》，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页。

宋代赣州禅师辈出、僧侣众多，在地方官府的重视下，他们与地方官吏共同努力，不仅修复了原有破损的寺院，而且还在赣州兴建了一批佛寺。巩丽君在《宋代江西佛教与社会》^①一文中，根据清光绪《江西通志》卷121—125《寺观》统计，赣州府加上南康府，有宋一代存在的佛寺共有95座，但其统计数据的对象有待商榷。^②《江西通志》中所记载的寺院，只是实际存在的一部分或大部分，而府志、县志的记载则较为详细，共计95座。见表2.2（宋代赣州佛寺分布表）。那些或存在的时间较短，或缺乏记载而没有流传下来的寺院，自然不包括在内。

表2.2 宋代赣州佛寺分布表

府域	县域	寺数	县域	寺数	县域	寺数	总计
赣州	赣县	16	于都	3	信丰	6	68
	兴国	12	会昌	4	安远	13	
	龙南	5	宁都	2	瑞金	3	
	石城	4					
南安军	大余	15	南康	5	上犹	7	27

注：赣州府的长宁、定南，南康府的崇义皆为明代设置，故不将此三县列入统计之中。

资料来源：明嘉靖《赣州府志》卷12《外志·寺观》；明天启《赣州府志》卷14《寺观》；清光绪《江西通志》卷121—125《寺观》、清同治十二年《赣州府志》卷16《寺观》、清同治《南安府志（八）》卷7《寺观》、清光绪《崇义县志》卷3《寺观》。

从表2.2统计的一系列数字来看，宋代赣州佛教寺院众多，赣州府和南康府下辖的各个县都有佛寺分布，但分布却不均衡。其中尤以赣州府的赣县、兴国、安远和南康府的大余佛寺最多，而其他地区则数量较少。究其原因，除了赣县、兴国、定远、大余等地地理位置优越，名山众多之外，相对富裕的经济、先进的文化，为佛教在这些地区的快速流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也表明，佛教与地区的开发有着密切的关系，开发越早，佛教就越强盛。

据清光绪《江西通志》和清同治十二年《赣州府志》中关于建寺人记载，宋代赣州佛寺的兴建主体是僧人，其次为地方官吏和邑人。寺院是僧尼生活与进行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为了更广泛的弘扬佛教，吸收信徒，扩大佛教的社

^①巩丽君：《宋代江西佛教与社会》，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②宋代赣州、南安军未曾设置长宁县、定南县和崇义县，这三县皆为明代所设置，因此，统计宋代赣州佛寺分布数量时，应将这三县排除。

会影响。僧人或化缘募捐、或求助于官府邑人，积极兴建佛寺。如僧志旬，于宋天禧年间（1017-1022）在大庾县创建的广化寺。僧月峰，于宋大中祥符乙卯（1015）在石城兴建的永福寺。龙泉僧本俊，于宋代在上犹县建立林咏寺。兴建于宋仁宗时期（1023-1063）的赣县合龙山寺，为僧行本“以宫中所赐珍物直千万贯创建”。^①宋代僧人在赣州建寺的例子在清光绪《江西通志·寺观》和清同治《赣州府志·寺观》中记载有限，但从这些有记载的资料中可以分析出，僧人主持兴建的寺院占宋代赣州新建佛寺的绝大部分。此外，地方富户和官员也为佛寺的修建做出了努力。清同治《赣州府志·寺观》中关于地方富户建立佛寺且有记载的有以下几所：宋至和二年（1055），邑人曾绍、陈可暹在雩都县修建了慧明塔。宋太平兴国七年（982），邑人刘仁举在信丰修建了金文寺。关于地方官员兴建佛寺的记载，较为典型的是在清光绪《崇义县志·寺观》中记载的：“普照寺在尚德里宋王辛任庐州鈐辖与金人战奏绩归建”。^②宋代赣州佛寺林立，分布广泛，是在封建国家政权的支持下，地方官吏、富室大户扶持与僧人本身共同努力的结果。

二 佛教文化 繁荣昌盛

佛教的繁荣昌盛，使赣州社会文化艺术融入了佛教的因素。儒释的交流、佛教典籍的编纂、金石书法上也有不凡的建树。成就最大的就是佛教雕塑艺术和佛塔建筑，无论其规模还是精美程度都令人啧啧称赞，这也彰显着佛教在古典文化艺术和地方社会文化中的交融程度。

宋代赣州，僧人亦好“诗书而尊儒雅”。士人尤其是被贬谪至赣州或途径赣州的官员常因寺院清幽宁静适合潜思静修，或“寄寓于寺”，或遍游赣州之名寺，与友人游景赋诗，与僧人探讨佛理，潜心向学，抒发心情，感悟人生，援佛入儒，有的还留下佛学著作，江公望就是其中典型代表。江公望，字民表，睦洲人。宋徽宗时（1100-1126），官至左司谏。后因上疏弹劾蔡京，为其所不喜，被贬至江西南安军（今为江西大余县），后遇赦还家。江公望贬谪南安后，住在宝界寺内，与僧人探讨佛理，潜心研佛，并撰写了佛学著作《轮藏记》。宋绍圣二年（1095），苏轼被贬惠州途径赣州时，与通守承议郎俞括同游崇庆禅院，写下《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表现出苏轼放任自然、随遇而安的超脱境界，这些既是受佛老思想的影响，也是其对人生价值的一种彻悟：

^① (清)魏瀛等修，钟音鸿等纂：《赣州府志》卷十六《寺观》，同治十二年刊本。

^② (清)廖鼎璋纂修：《崇义县志》卷三《寺观》，光绪二十一年刻本。

吾非学佛者，不知其所自来，独闻之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夫有思皆邪也，善恶同而无思，则土木也，云何能便有思而无邪，无思而非土木乎！呜呼，吾老矣，安得数年之暇，托于佛僧之宇，尽发其书，以无所思心会如来意，庶几于无所得故而得者。谪居惠州，终岁无事，宜若得行其志。而州之僧舍无所谓经藏者，独榜其所居室曰思无邪斋，而铭之致其志焉。^①

因绍兴十三年癸亥（1143）五十二岁时贬谪横浦（今江西大余）十四年，故又号横浦居士的张九成又是一代表。“张九成谪横浦，寓城西宝界寺。其寝室有短牕，每日昧爽辄执书立窗下，就明而读，如实者十四年。泊被归，窗下石上，双趺之迹隐然，至今犹存。”^②张九成远离朝堂的倾轧，在佛寺中找到了妙不可言的宁静。于是，他闭门读书，潜心著述，援佛入儒，创立“横浦学派”，可谓“上蔡（谢良佐）之说一转而未张子韶，子韶一转而为陆子静（陆九渊）。”^③

佛门僧人由于长期进行佛经的抄写、镌刻活动，因此在金石和书法上造诣颇深，僧人书法家辈出。最为著名的就是至今仍存于赣县龚公山宝华寺的《西堂智藏禅师塔碑》。神宗元丰二年（1079），杨岐宗三世觉显书丹重刻《西堂智藏禅师塔碑》，书写工整遒劲，被视为金石艺术的珍品。

佛教的兴盛，推动了佛塔建筑、佛像雕刻工艺的发展。佛塔恢弘大气，佛像造型优美，技艺高超。佛塔建筑方面，赣州慈云塔、石城宝福院塔，挺拔秀丽，十分壮观。赣州慈云塔位于慈云寺内，始建于仁宗天圣元年（1023），塔底有“天圣二年女弟子陶氏一娘舍钱二十吊”和“舍利塔僧”等铭文砖，塔身“高十数仞，九级檐栏周”^④石城宝福院塔在宝福院后，建于徽宗崇宁元年（1102），僧应可募造，“塔中叠级，层楼外绕栏槛”。^⑤佛像雕刻方面，属赣州通天岩上的佛像最为著名。综观通天岩石窟的摩崖造像，不同时期的造像风格各不相同。唐末属于初创时期，由于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以雕造菩萨为主；而北宋则是其鼎盛时期，则又以雕造罗汉像为主。通天岩石窟以其数量之众，造型之优美，

^①（北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②（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③（清）黄宗羲等撰：《宋元学案》卷二十四《上蔡学案》。

^④（清）魏瀛等修，钟音鸿等纂：《赣州府志》卷十六《寺观》，同治十二年刊本。

^⑤（清）道光《石城县志》卷3《寺观》，清道光四年（1824）刻本。

冠绝于江南，是我国江南地区最大的一处佛教石窟。

2.2 成为佛教胜地：宋代通天岩的开发

通天岩石窟佛龛的开凿始于唐末，由于适宜的自然地理环境、良好的社会环境、佛教的世俗化等原因，使得通天岩上的石窟佛龛建造在宋代到达顶峰。石窟佛龛的大量建造，官员士绅的崇信，增添了通天岩的佛教意蕴，使其在两宋时期逐渐成为赣州的佛教胜地。

2.2.1 通天岩石窟的建造及其原因

通天岩石窟规模之大，在江南地区实为罕见，主要分布于忘归岩、龙虎岩、通天岩和翠微岩。通天岩上现存石窟佛龛 315 处，共计造像 359 尊，都是唐宋时期建造的。综观通天岩的摩崖造像，唐末属于初创时期，而到了宋代特别是北宋时期，通天岩石窟的修造达到鼎峰。通天岩原本是一座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山岭，为何会在两宋时期修建如此之多的石窟佛龛，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笔者通过翻阅史料、实地考察，认为应该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 通天岩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优越的地理位置

石窟寺是指就着山势，从山崖壁面向内部纵深开凿的古代庙宇建筑，里面有宗教造像或宗教故事的壁画。作为一种特殊的佛教建筑，它的选址必然受到自然环境的限制。一般而言，石窟寺只有建在天热的大面积的悬崖石壁上，从我国地理条件来看，只有在石灰岩炎热地貌和丹霞地貌地区才最适合于石窟寺的开凿。我国绝大多数的石窟寺，就是选择在具有这两种地貌的地区开凿而成的。如龙门石窟，就是位于石灰岩炎热地貌地区，而甘肃的麦积山、炳灵寺，四川的大足，就是建造于红砂岩丹霞地貌地区。赣州的通天岩石窟，也是一座在丹霞地貌地区依据山貌开凿出来的石窟寺。

除了拥有江南其他地区所没有的丹霞地貌之外，通天岩上还有大量的天然岩洞可以利用，明嘉靖年间编写的《赣州府志》就这样记载：“通天岩，县西二十里，岩下空峒如屋，僧即为居。”^①这也就无需另外开凿洞崖，可以就近取材，将佛像直接雕凿在丹崖绝壁和溶洞之内了。

在江西境内发育有丹霞地貌的地区有 40 多处，而赣州就占据了 20 处左右。

^① (明)董天赐：《赣州府志》卷之二《山川》，嘉靖十五年本。

作为赣州下辖的于都罗田岩，同样具有开凿成为石窟寺的丹霞地貌，但由于其地处山区，远离市区，使得开凿成本和难度都远远超过位于赣州城郊的通天岩。相比之下，通天岩地处赣州城近郊，而赣州城自东晋以来，一直是赣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同时由于大庾岭商路的开通，使得赣州城成为连接我国东南地区、珠江和闽江的交通枢纽。^①这条沟通南北的商道不仅给赣州城带来了经济的繁荣，而且在宗教传播和文化交流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正是由于通天岩所处的独特的地理位置，从而使得大规模修造石窟佛龛成为可能。

二 社会经济的发展

北宋时期赣州地区相对稳定，但由于当时政府在盐区划分上不合理以及盐政管理上的混乱导致盐贩与稽查官兵之间发生过一些偶发冲突，其中除了皇祐四年（1059），虔州盐寇戴小八攻害数邑，杀虔化县令之外，^②绝大多数的事态并没有发展到像南宋中晚期时那样公开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直接反对政府官兵的叛乱。总体而言，赣州地区的社会虽有小的动荡，但社会仍以平稳为主。^③

唐宋以后，我国经济中心南移，赣南地区靠近经济中心，在经济中心强大的辐射作用下，赣州的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农业上，不仅在原有有限的平原地带耕种基础上，而且广泛的在山区开垦梯田，充分挖掘粮食生产潜力，从而成为江西重要的产粮区之一。同时，赣州也是江西著名的茶叶产区，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绍兴年间，官方在赣州府的瑞金、赣县“榷茶”（即政府统购专营）10004斤；南安军的大庾、上犹、南康榷茶4150斤。^④不仅茶叶产量颇多，而且茶叶种类丰富，主要名品有泥片茶、芥茶等二十六类。手工业方面，赣州也有长足的发展。北宋官方在虔州（即赣州）设全国都大坑冶铸铁司，并对银、铜、铁、锡、铅等矿场设置场监进行官营开采，如政和四年（1115），在赣州府下辖的于都县银坑圩开设银场炼银。除此之

^①参看：刘良群：《大庾岭古干道》（载于《文史知识》，1998年第1期）；王若枫、肖红：《张九龄开凿大庾岭新路的政治文化意义》（载于《韶关学院学报》，2009年第10期）；饶伟新：《赣南地方文献与大庾岭梅关的文化象征》（载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6期）；李玉宏：《试论张九龄开凿大庾岭驿道的意义——从大庾岭的战略地位及广州商业外贸发展方面的探讨》（载于《韶关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

^②《宋会要辑稿》兵十一之二十六。

^③关于北宋时期赣州地区的社会稳定问题，笔者主要参考福建师范大学邹春生博士的毕业论文《王化和儒化：9-18世纪赣闽粤边区的社会变迁和客家族群文化的形成》，并赞同他对于两宋时期赣闽粤边区社会动荡问题的研究。

^④《宋会要辑稿》之食货二九之三。

外，政府还在赣州设置提点刑狱铸钱监。制瓷业在当时也是一项主要产业。江西是宋代制瓷中心之一，景德镇和吉州永和镇的制瓷业十分发达。受此影响，位于赣州城区东南郊4公里处的七里镇也成为当时一个著名的瓷器产地。同时，赣州的造船业也异常发达。北宋时期，政府分配给虔州的造船数目为605艘，造船数名列各州之首。^①商业方面，“金银、香茶、犀象、百货亦同之，惟岭表陆运至虔州而后水运”，^②过境贸易和输出贸易的繁荣，促进了赣州商业的发展。

嘉祐八年（1063），时任权知南安军、提点江西刑狱、提举虔州盐政的蔡挺与其时任广东转运使的哥哥蔡抗合作开凿整修的大庾岭商道，更是锦上添花。不仅促使赣州战略地位的提升，同时也成为赣州沟通中原与岭南地区、沿海与内陆的交通枢纽。我们从相关文献的描述中就可以得知：“岭路既开，用是如粤。或迁谪岭表者，悉取此道。”^③“故之岭南虽三道，下浈水者十七八焉”^④，除此之外，赣州开辟了到福建的交通线路，它从赣州溯江而上。然后翻越武夷山进入福建地区，从而沟通了赣闽两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三 佛教的世俗化、平民化

宋代佛教在唐代基础上，不仅继续发展，而且呈现世俗化、平民化的趋势。从佛寺兴建主体来说，宋以前，以僧人募捐为主，而两宋时期，官员士绅则投入到建寺的运动中来，上文中所提到的于都的慧明塔，信丰的金文寺，崇义的云峰寺就是很好的例证。除此之外，通天岩上面的许多佛龛为官绅捐造。“蔡披佛龛题名—右司理参军蔡披舍”“饶师传佛龛题名—宣德郎虔州教授饶师传舍”^⑤从民俗方面来说，宋代赣州民众普遍信佛奉佛，如赣州府“伉健工巧好佛信”。^⑥停柩于寺以待下葬的风俗，也在宋代赣州存在。“户部郎中彭合，吉州庐陵人，知赣之信丰县。……公将出郊劝农前一夕，梦妇人来诉曰‘妾侨寄水东寺中’明日至寺，询之，则某家妇旅殡久矣，趣其家葬之”。^⑦

宋代佛教深入民间社会，广泛的参与地方社会活动，使得佛教逐渐世俗化、平民化。世俗化、平民化的佛教，不仅为佛教徒的发展提供了土壤，而且也为

^①陈文华、陈荣华主编：《江西通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转引自《北宋虔州、吉州造船业》，《文史知识》，2008年第11期。

^②（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国用考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明）刘节：《南安府志》，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上海书局影印1989年版，第331页。

^④（宋）余靖：《武溪集》卷五《韶州真水馆记》，文渊阁四库全书。

^⑤赣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丹崖悠悠：赣州市通天岩摩崖石刻集锦》，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7、9页。

^⑥（清）光绪《江西通志》卷48《风俗》。

^⑦陈柏泉《江西出土墓志选编》《户部郎中彭合行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

普通民众更好的参与到佛教活动中来提供了可能。

2.2.2 佛教胜地的形成

北宋赣州佛教兴盛，寺庵众多。当时赣州城内比较著名的寺庙有光孝寺、寿量寺、慈云寺、开元寺、景德寺、崇庆禅院、报恩寺、笔峰山寺、丰乐寺等。城郊也有一批寺庙，如、天竺寺、宝云寺等。除此之外，通天岩上亦有古庙，“通天岩，县西二十里，岩下空峒如屋，僧即为居”，^①但其名声不显。

通天岩在两宋时成为赣州的佛教胜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北宋初期的通天岩名声不显，虽有寺庙，但佛教气息淡然。北宋熙宁年间，阳孝本隐居于此，以佛寺为邻，并将其部分财产捐赠于岩中佛寺。由于其德行高尚，四方名士皆来游，通天岩名声方显。据清同治《赣州府志》所载：“阳行先，隐居于通天岩，有赵抃题名及张无尽所琢石佛”。张无尽即张商英，字天觉，号无尽居士，北宋新津人氏，当时名宦，笃信佛教。他曾来赣州通天岩访阳孝本，并作《赠玉岩诗》。唐宋时期，中国石窟造像从北方逐渐南移，四川正是其中的代表。作为四川人的张商英对此自然非常清楚。他与阳孝本游览通天岩时，见通天岩环境清幽，奇石凌空，岩中有古寺，四周有佛龛，随即请来工匠修凿佛像。这是北宋时期通天岩上开凿佛龛最早的记录。此后，通天岩上的佛龛建造愈来愈多。

通天岩佛龛的建造历史兴起于唐末，繁荣于北宋。现存通天岩上的佛龛大多建造于北宋时期，有记载的佛龛造像大多是在张商英之后。在通天岩上的摩崖石刻的记载中，关于佛龛建造主体的记录有以下条目：

北宋时期

蔡披佛龛题名

右司理参军蔡披舍

傅必成佛龛题名

钱塘傅必成造立

饶师传佛龛题名

^①（明）董天赐：《赣州府志》卷之二《山川》，嘉靖十五年本。

宣德郎虔州教授饶师传舍

任方佛龛题名

西头供奉兵马监押任方舍

陆蕴佛龛题名

承奉郎知瑞金县事陆蕴舍

张激佛龛题名

左司理参军张激舍

魏闳佛龛题名

承议郎签书郎魏闳舍

路氏佛龛题名

提刑司检法官路口口舍

朱敏功佛龛题名

朝散大夫知军州事朱敏功舍

明鉴题圣号铭

广胁山位居第十三号圣因揭陀尊者。劝缘僧明鉴。

明鉴题圣号铭

僧伽荼州位居第七圣号迦里迦尊者。劝缘僧明鉴。

明鉴题圣号铭

毕利毘瞿州位居第十一圣号罗怙罗尊者。劝缘僧明鉴。

明鉴题圣号铭

耽没罗洲位居第六圣号跋陀罗尊者。劝缘僧明鉴。

明鉴题圣号铭

钵刺擎洲位居第八号伐罗弗多尊者。劝缘僧明鉴。

明鉴题圣名号

遵涅弥罗国位居第二号加诺法蹉尊者。劝缘僧明鉴。

明鉴题圣名号

东胜身洲位居第三圣号迦里迦跋厘堕闍尊者。劝缘僧明鉴。^①

南宋时期

^①赣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丹崖悠悠：赣州市通天岩摩崖石刻集锦》，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7-14页。

张翬佛龛题名

通议大夫前尚书右丞张翬。

朱氏造像记

虔州赣县右通利坊，朱氏同男吴豫，施觉华如来座飞凤。

追召亡夫吴十四解元受生净域。

朱氏造像记

虔州赣县右通利坊，朱氏同男吴豫，施弥勒尊佛。

追召亡女吴氏小娘受生净域。^①

表 2.3 宋代通天岩佛龛统计表

时代	建造主体	数量
北宋	僧人	7
	官员	9
南宋	官员	1
	士绅	2

资料来源：赣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丹崖悠悠：赣州市通天岩摩崖石刻集锦》

从上述材料以及表 2.3 中，我们不难发现，北宋时期留下记载的建造的佛龛有 16 座，南宋的只有 3 座。这一方面说明北宋时期，通天岩佛龛建造的数量之多，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北宋通天岩佛教的兴盛。从佛龛建造的主体来说，除却劝缘僧明鉴所舍造的 7 座佛龛之外，余下的皆为官员士绅捐建。这不仅说明佛教在官员士绅阶层中的影响力之大，同时也说明通天岩成为官员士绅崇佛、敬佛的一个圣地，通过修凿佛龛，来表达对佛的虔诚。

从南宋庐陵（今江西吉安）人胡榘刻留在通天岩上的诗中能够发现，到南宋时，通天岩上面的佛龛已成规模。“万龛石佛坐观空，安用悬崖驾梵宫”。^②两座朱氏所捐造的佛像不仅可以看出南宋佛龛兴建的萎靡，同时也可以看出普通民众在亲人逝去之后捐造佛像，以此希望他们能够“受生净域”，佛教的因果轮回思想已深入人心。

2.3 成为士大夫郊游胜地：宋代通天岩在地方社会的意义

^①赣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丹崖悠悠：赣州市通天岩摩崖石刻集锦》，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 年 9 月版，第 6-27 页。

^②赣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丹崖悠悠：赣州市通天岩摩崖石刻集锦》，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 年 9 月版，第 21 页。

通天岩在宋代时成为士大夫郊游胜地，除了它本身所具有的独特的社会环境之外，更主要的是由于其自身的文化气息契合了往来赣州的士大夫，吸引他们来此游山乐水、寻访佛迹、凭吊先贤。

赣州地处赣粤边区，而这一地区因为山高林深，道路崎岖，瘴雾严重，“虔州，江南地最旷，大山长谷，荒翳险阻”^①所以隋唐之前一直没有得到开发。五代以降，随着大量人口不断往这里迁移，使得原本人迹罕至的地区变得人口大增，社会动荡，出现了史籍记载的“盐寇”、“虔寇”和“峒寇”，因此被人称之为“盗贼渊薮之地”，也是我国历史上动乱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根据李坚的统计，有宋一代赣粤动乱多达 64 起。^②

如前所述，唐宋以后，我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作为毗邻经济中心的赣州，其经济地位自然随之水涨船高，不容小觑。同时由于赣州重要的地理位置，宋代杨万里在谈到赣州城时说：“赣之为江，控江西之上流，而接南粤之北陲，故里专一路之兵钤，而外提二境之戎柄，其地重大。”^③元朝伍庠也曾提及南安府，说：“控广引闽，……地虽偏远，而据上流，遏边檄”。^④而频繁的盗贼祸事、兵乱严重威胁着中央政府的统治，因此，有宋一代，中央政府十分重视对赣州的控制和管理。

嘉佑八年（1063），大庾岭商道在蔡挺兄弟的整修之下重新被开通，这对宋王朝加强对赣闽粤地区的控制与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为派遣官员到达这些以前所谓的“蛮荒之地”提供了可能。

赣州以其在政治、经济、交通位置的重要性而吸引了许多官员士大夫们驻足停留，而通天岩又成为他们必去之地。究其原因，除了通天岩自身景色秀美之外，阳孝本的故事也吸引众多士大夫或争相拜谒，或踏寻古迹，或凭吊先贤。

阳孝本字行先，赣州人，其“学博行高，隐于城西通天岩凡二十年，一时名士多从之游。苏轼为号曰玉岩居士，赞其真曰，道不二，德不孤，无人所有，有人所无。”^⑤由此可以看出，由于阳孝本学识渊博、德行高尚，在通天岩隐居二十年间，当时许多名士前去拜谒，这其中就有蒲宗孟、苏轼等当世名宦、名士。蒲宗孟，字传正，神宗朝拜尚书左丞，曾聘阳孝本为西席（家庭教师）。后

^①王安石：《虔州学记》，《临川文集》卷八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李坚：《宋代赣粤边区地域社会变迁—以动乱为中心的考察》，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年。

^③（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 79《江西》，文渊阁四库全书存目第 171-172 册。

^④（明）刘节：《南安府志》，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上海书局影印 1989 年，第 317 页。

^⑤（清）和珅等修：《钦定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五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阳孝本辞馆南归，蒲宗孟敬佩阳孝本的才学和德行，在汝阳庵中写了怀念阳孝本的《汝阳庵中有怀》一诗。阳孝本感念蒲宗孟对他的友谊，在其隐居的通天岩刻下了这首诗。另一位当时名士，大文豪苏轼也与阳孝本留下了一段脍炙人口的故事。宋哲宗年间，苏轼被贬岭南途径赣州城时，听闻阳孝本的名声，遂去览通天岩拜访他，两人一见如故，同游赣州名胜郁孤台、八镜台、光孝寺，随后相伴游览祥符宫，又观赏光孝寺旁的濂泉并赋诗。后人建夜话亭于侧，感念他们之间的友谊。七年后，苏轼遇赦北归，当他再去通天岩看望老友时，阳孝本已然去世。他便重游赣州名胜，徘徊于与阳孝本夜话的濂泉旁，久久不肯离去。

宋代通天岩不仅是让众多士大夫钦佩的儒家学者阳孝本晚年隐居之地，还是赣州佛教胜地。宋代佛教兴盛，影响极大。陈寅恪先生曾说：“自宋以后，佛教已入中国人之骨髓，不能脱离”^①，宋代士大夫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自然不能脱离于此。有宋一代，相当多的士大夫热衷于佛门经典。其中就包括赵抃、欧阳修、王安石、苏辙、张商英等曾位居相位的朝廷重臣。也包括一些文坛上的重量级人物，如苏轼、黄庭坚以及欧阳修。甚至于积极排佛的理学大家也向学于佛教，如周敦颐就曾从学于润州鹤林寺的寿崖禅师。二程之一的程颢，对佛教丛林的清规戒律评价甚高，认为“三代威仪，尽在世亦”^②。明人罗钦顺曾总结：“二程子、张子、朱子早岁皆尝学禅，亦皆能究其底蕴”^③。由此可见，宋代士大夫与佛教互动频繁，且关系匪浅。而作为赣州的佛教胜地，通天岩上浓厚的佛教文化气息自然吸引着这些士大夫。

经济地位的提升，频发的兵乱，大庾岭商道上的枢纽，导致赣州在宋代的重要性大大增加，来往官员士大夫增多。而作为阳孝本隐居的通天岩，不仅见证了蒲阳、苏阳之情谊，阳孝本之学识德行，而且吸引着了当时士人和后来人。同时，通天岩上的佛教气息更是契合了士大夫们的兴趣，据通天岩题刻内容粗统计，大约有超过九十位官员士绅曾来通天岩。^④他们或三五邀约、或独自一人，驻足游览，凭吊先贤，瞻仰古迹，享受着代表赣州的通天岩带给他们别样的文化气息和内涵。通天岩因此成为士大夫们的郊游胜地。

^①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2页。

^② (宋)程颢、程颐撰，朱熹编：《河南程氏外书》卷12，清光绪三十四年刻本。

^③ (明)罗钦顺著，陶培点校：《困知记》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4页。

^④ 赣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丹崖悠悠：赣州市通天岩摩崖石刻集锦》，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28页。

第三章 从阳孝本到王阳明：儒学与通天岩的教化意义

3.1 阳孝本与通天岩

阳孝本，字行先，号玉岩。生于北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卒于宣和四年（1122），终年84岁，北宋虔州梅峰堡小逻团（今赣州市上犹县安和乡莲花井村）人。少时勤奋好学，并负文名。神宗熙宁（1068—1077）中，29岁的阳孝本游学汴京（今开封）上庠（即大学）。因才华出众，学识渊博，被左丞蒲宗孟聘为西席（教师）。当时柄臣蒲宗孟，名宦苏颂皆以山林特起推荐阳孝本入仕。后因看不惯统治阶层的腐败，辞馆南归，不收束脩（馆金）。蒲宗孟乃尽购国子监书以赠之，并作诗送之，时任虔州府幕的彭迪明请匠人冯宽将蒲送与阳的两首诗刻在阳孝本隐居的通天岩上。至今在通天岩上仅存的摩崖石刻中仍能清楚的看到这两首诗。

阳行先南归

收书万卷日沈酣，鲍谢篇章老更耽。
不分红尘来汝上，却随明月入江南。
家无四壁堪投足，郡有千山可结庵。
遥想赣溪风雨夜，与谁挥麈对清谈。

汝阳庵中有怀

幽怀慕岑寂，结庵在中林。
绿竹君子操，清池故人心。
明月弄寒影，好风摇翠阴。
江南千里远，何处盍朋簪。^①

当时虔州郡守林颜对他十分推崇，不仅为其在岩上题写“玉岩居士”，而且写下了《林颜赠玉岩诗》，并将其刻在通天岩上：

^①赣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丹崖悠悠：赣州市通天岩摩崖石刻集锦》，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页。

万卷收书肯未贫，常年石室谢纷纭。
冥鸿有志难寻迹，静鹿无心不出群。
拔俗风标清似水，动人富贵薄如云。
柄臣欲强东山起，只恐东山未放君。^①

北宋绍圣元年（1094），大文豪苏轼被贬至岭南途径赣州时，专程前往通天岩拜访阳孝本，两人详谈甚欢，相见恨晚，相偕同游光孝寺、郁孤台等赣州名胜。一天，他们游廉泉亭，饮廉泉水，并在此彻夜畅。后人为纪念这件事，在他们夜话之地重建了一个亭子，并取之为“夜话亭”。苏轼当时虽名满天下，但对阳孝本的为人和学识却十分欣赏和敬佩。他有诗赠与阳孝本：

空空惟法喜，心定有天游。
摩诘原无病，须洹不入流。
库嫌寻直枉，左待寸田秋。
虽为麒麟阁，已逃鵩鵠洲。
酒醒动风竹，梦断月窥楼。
众谓元德秀，自称阳道州。
拔葵终相鲁，辟谷会封留。
用舍俱无碍，飘然不系舟。^②

七年后，苏东坡遇宋徽宗大赦，从海南北归途中又重访通天岩，拜谒阳孝本，却发现故人已歿。赣州邑人为了纪念阳孝本与苏轼的这段相知之谊，在通天岩上的寺中建“玉岩祠”，祠内供有阳孝本与苏轼的石刻像，并且刻有苏轼的诗。苏轼见之非常感动，写下了《赞玉岩像》，赞其超然尘世、飘逸洒脱：

道不二，德不孤。无人所有，有人所无。世之所宝者五，天啬其三，而畀其二。是以日计之不足，岁计之有余。^③

^①赣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丹崖悠悠：赣州市通天岩摩崖石刻集锦》，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页。

^②转引自周建华：《千古夜话说到今——赣州“苏阳夜话亭”考释》，乐山：《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③（清）《江西通志》卷一百一十九，钦定四库全书本。

阳孝本在世隐居通天岩时，曾被多位官员举荐，一位是北宋谏官邹浩，他在《荐阳孝本状》中如是写道：

伏见虔州布衣阳孝本，蚤居太学，蔚以贤称。既乃幡然不求仕进，竭力置书数千卷，归隐通天岩。乡人以其贫甚出钱助之，一无所受，其学通乎今古，其行拔乎世俗行，行年高亦，而志不少衰，宜被褒扬以劝多士。^①

另一位则是时任赣州知府的郭知彰，他在北宋崇宁中，以经行优异推荐于朝。北宋著名学者、官员，曾任工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的杨时当时亦写下荐状：

代虔守荐阳孝本

臣猥以菲才谬当郡寄，窃惟事君之义，莫尚以人，而不详之实，蔽贤为大，苟有所知，臣敢不勉！伏见虔州进士阳孝本学富行纯，为舆论信服。囊游京师，一时忠义之士多从之。学袒褐，不完饭，疏饮水，而束脩之馈，悉以市书捆载而归，自晦岩穴不求仕进。乡间故旧怜其贫，协力周之，非其义不受也。此虽古人，操履无以过之，当路柄臣亦尝论荐然，久未蒙旌擢伏，望圣慈不以臣言之轻，特加收采，锡之一命，以称朝廷尊德励善之实。^②

阳孝本几次被举荐，且这些举荐者并非同一官员，这就充分反映出阳孝本在当时其德行和才能所产生的知名度之高。

被举荐的阳孝本举八行，解褐国子录，再转博士。宋大观三年（1107），68岁的阳孝本被朝廷任命为直秘阁参事，不久挂冠归隐通天岩，重返山水之间。过着一鹿一童自相随的恬淡生活。时李存亦以高年挂冠，日与殇咏，与阳孝本号崆峒二老。宋宣和四年（1122），84岁的阳孝本在通天岩无疾而终，葬于通天岩西麓石穴。宋宣和年间，徽宗皇帝追赐阳孝本为“南赣乡贤”。通天岩上有明宪使赵元建的“玉岩祠”。

元朝名宦脱脱主持编纂的《宋史》中，将阳孝本列入“隐逸”一栏中，并对其生平做了介绍，且对他评价甚高：

阳孝本，字行先，虔州赣人。学博行高，隐于城西通天岩。苏颂、蒲宗孟皆以山林特

^①（宋）邹浩：《道乡集》卷二十，钦定四库全书本。

^②（清）《江西通志》卷一百一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起荐之。苏轼自海外归，过而爱焉，呼之曰玉岩居士。尝直造其室，知其不娶，戏以为元德秀之流。孝本自言为阳城之裔，故轼有诗云众谓元德秀，自称阳德州，嘉之也。隐遁二十年，一时名士多从之游。崇宁中，举八行，解褐为国子禄，再转博士以直秘阁归，卒年八十四。^①

除却《宋史》对阳孝本生平有记载之外，《钦定续通志》、《明一统志》、《钦定大清一统志》中对阳孝本的生平均有记载。^②除却正史记载之外，嘉靖版、天启版、同治版《赣州府志》对阳孝本生平事迹也颇多介绍。^③其中尤以同治版《赣州府志》中关于阳孝本生平的记载最为详细：

阳孝本，字行先，赣县人，学博行高。熙宁中游上庠，休瀚未尝，出外与左丞汝阳蒲宗孟交，蒲尽市国学书与之，归隐通天岩，郡守林颜题曰玉岩。孝本生平不娶。苏轼过访，直造其室，呼曰元德秀，孝本曰：余乃阳城之裔也，不娶直欲肖视耳。故轼诗有“人谓元德秀，自称阳道州”之句。又赞其像曰：道不二，德不孤。无人所有，有人所无。世之所宝者五，天啬其三，而畀其二。是以日计之不足，岁计之有余。人以为实录，崇宁中举八行，解褐国子禄，再转博士，乞休。朝廷宠以奉议郎直秘阁，赐绯鱼袋，领宫祠以归。晚年妾生二子，每拊其首曰：吾无以遗汝，惟有书数千卷。卒年八十四祀乡贤。李存浑之子，元丰二年进士，不乐仕进，同孝本隐通天岩，人号崆峒二老。^④

除却正史、地方志中关于阳孝本的记载之外，至于其他自北宋以降诸多士绅官员、文人墨客撰写诗歌、游记赞颂阳孝本高风亮节、德行纯良、知识渊博的就更加不胜枚举了。由此可见，作为一个出生于赣州，生命中大部分时间生活于赣州的士人来说，阳孝本可以称得上是赣州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具有如此影响力的文化名人。以至于到了清代，赣州本地官员士绅仍然对其推崇备至，道光年间于都候补教谕谭锦撰写的《于都澄江谭氏捐田奉通天岩香火记》中，就曾这样写道：

^①（元）脱脱：《宋史》卷四百五十八《隐逸》，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参看：《钦定续通志》卷五百七十《隐逸传》（钦定四库全书本）；《明一统志》卷五十八《赣州府》（钦定四库全书本）；《钦定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五十四《赣州府·二》（钦定四库全书本）。

^③参看：（明）董天赐：《赣州府志》卷十《贤达》（嘉靖十五年本）；（明）余文龙、谢绍等纂修：《赣州府志》卷十六《乡贤》（天启元年修，清顺治十七年重刻本）；（清）魏瀛等修，钟音鸿等纂：《赣州府志》卷五十四《儒林》（同治十二年刊本）。

^④（清）魏瀛等修，钟音鸿等纂：《赣州府志》卷五十四《儒林》，同治十二年刊本。

通天岩，郡人阳玉岩先生之读书堂也，先生行谊文章，卓然有名于宋室。同时如杨龟山、苏玉局、蒲传正，异代如王文成公辈，咸心折焉。后因其堂建为寺，以奉佛印。于其旁为祠，以祀先生。由宋迄今，七百有余岁。盖桑梓之敬先生者，非一日矣。^①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阳孝本无论是在其生活的宋代，还是在此后的明代、清代，世人无不被其渊博的学识、崇高的品德所折服。后人为纪念阳孝本，建祠于通天岩，民众对阳孝本的崇敬之心可见一斑。“盖桑梓之敬先生者，非一日矣”。

戴显群、王营绪在《正史<隐逸传>反映的隐士隐逸原因及编撰意图》中认为隐士隐逸有六个原因：或因性情恬淡、清心寡欲、寄情于山水；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有道则仕、无道则隐；或受佛教思想影响，心神空寂、超脱人生；或受传统道德的影响，不作贰臣、高尚其事；或受道家思想影响，崇尚无为，崇尚自然；或因仕途不畅，事业受挫，退隐山林。^②作为宋代有名的隐士，阳孝本隐居不出，不仅因为本身性情恬淡、清心寡欲，而且受佛教思想影响颇深。阳孝本少时喜学佛之禅定，隐居通天岩后将自己家产的三分之二捐赠给通天岩上的佛寺，并且自号玉岩居士（居士一词，通常是对信奉佛教而在家修行者的称呼）。

佛教自东汉传入，长期与本土道教、儒学、玄学相互影响、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化的佛教道路。到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得到极大发展，成为我国最有影响力的宗教。佛教的传入极大的丰富了中国思想，佛教的性空学说与超脱生死的境界，不仅符合隐逸的心境，同时也给隐逸思想提供了某些理论依据。宋时士人对现实社会不满或政治失意时，便会不由自主的想从佛教精神世界中寻找慰藉。受佛教义理影响，他们往往会选择隐逸于山林生活。而隐逸的士人与佛教僧人往往会有精神上的共鸣点，因此，我国历史上隐士大多与僧人交往频繁，关系密切。

综上，作为赣州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如此之大影响力的文化名人，阳孝本隐

^①赣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丹崖悠悠：赣州市通天岩摩崖石刻集锦》，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62页。

^②戴显群，王营绪：《正史<隐逸传>反映的隐士隐逸原因及编撰意图》，长沙：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5卷第2期。

居二十余载的通天岩也自然而然的具有了赣州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文化象征意义。而佛教与代表儒家文化的士大夫在通天岩上的和谐共存，更为通天岩平增了几分文化气息。

3.2 王阳明讲学活动对通天岩的影响

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子，人称阳明先生，生于成化八年（1472），卒于嘉靖七年（1528），弘治己未进士，浙江余姚人，后人视其为明代气节、文章、功业第一人。王阳明的一生是极富传奇色彩，曾被贬贵州龙场，也曾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封新建伯。龙场悟道是其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阳明学说自此逐渐成型。

王阳明与江西有着深厚的渊源。王阳明 17 岁时奉父命娶的妻子诸氏，便是江西人氏。王阳明于正德五年（1510）就任吉安府庐陵县知县，由于其真心为百姓着想，干实事，深受百姓爱戴。正德十一年（1516），王阳明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使，巡抚南（安）、赣（州）、汀（州）、漳（州）等处。自此至正德十六年（1521）六月离开江西这段时间，是其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光，王阳明既以杰出的才能达到了其功业的鼎峰，又以其卓越的思辨才能获得了思想上的建树，并设学习开书院以广教化，且自己收徒讲学，以此来推行其学说。王学在明中后期波及天下，正是奠基于他在江西这段经历。其后学虽有“浙中”、“江右”、“楚中”、“北方”及“粤闽”等学派，唯有“江右”与“浙中”对王学贡献最大。

从讲学角度来说，王阳明在赣州任南赣巡抚，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巡抚是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节制一方，司、道、府、县都是其下属，没有掣肘力量，有职有权，扩大讲学场所，调拨经费比较容易。特别是南赣巡抚，远离江西省府，本省的镇守太监和巡抚御史较难干预。所以，王阳明任南赣巡抚期间，其门人弟子也云集赣州，设在赣州的巡抚衙门成了王阳明初期的讲学场所。

这些弟子中，仅《阳明年谱》上列出姓名的，就有薛侃、欧阳德、梁焯、何廷仁、黄弘纲、薛俊、周仲、周冲、周魁、郭持平、刘道、袁梦麟、王舜鹏、王学益、余光、黄槐密、黄鳌、吴论、陈稷刘、鲁扶黻、吴鹤、薛侨、薛宗铨、欧阳昱等二十六人。而《年谱》中没有列出姓名的还有邹守益、罗洪先、刘阳、陈九川等。在同治版的《赣州府志》记载中，许多赣州籍的士人投入到阳明门

下，追随左右，其中有一些也未被记录在《年谱》中。

表 3.1 赣州王学门人

籍贯	王学门人
雩都人	何 春、袁庆麟、何廷仁、黄宏纲、李一龙、管 登、胡夷简、李乔崇
信丰人	余 庆
赣县人	刘 潜
龙南人	月 华
宁都人	赖 元、李大集
会昌人	刘 国、赖 贞
兴国人	萧 珩
大庾人	刘宰

资料来源：（清）魏瀛等修，钟音鸿等纂：《赣州府志》卷五十四《儒林》，清同治十二年刊本；（清）石景芬等纂：《南安府志》卷五十四《儒林》，同治七年本。

除了表 3.1 中所记录的赣州籍阳明学子之外，另外在同治《赣州府志》中，收录到《儒林》中的明代士人，除却卢鸿、俞溥、彭希贤、孙孔述、李涞五人不是王门子弟，其余或听过阳明讲学，或投入其门下。由此可见，王学在赣州传播程度之广，从而形成了一股各地学子、士人纷纷来赣州听王阳明讲学的热潮：

先生出入贼垒，未暇宁居，门人薛侃、欧阳德、梁焯、何廷仁、黄弘纲、薛俊、杨骥、郭治、周仲、周冲、周魁〔二〕、郭持平、刘道、袁梦麟、王舜鹏、王学益、余光、黄槐密、黄鳌、吴伦、陈稷刘、鲁扶敝、吴鹤、薛侨、薛宗铨、欧阳昱，皆讲聚不散。至是回军休士，始得专意于朋友，日与发明《大学》本旨，指示入道之方。^①

王阳明在平定动乱期间，仍有大批弟子追随其左右。虽然军务繁忙，但他也极力抽出闲暇时间与弟子论学、专意于朋友。他的这种精神，更加吸引了众多士子的追随。由于学生越来越多，巡抚衙门无法容纳，“四方学者辐辏，始寓射圃，至不能容，乃修濂溪书院居之”。^②王阳明遂于正德十三年（1518）在赣州

^①（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三《年谱一》。

^②（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三《年谱一》。

建立书院，称“濂溪书院”。据王藩《重建阳明书院记》记载：“甫抵赣，即修濂溪书院以居学者，而自置讲堂于后，闻良知之说，与周子至诚无伪之旨相发明，学者翕然师尊之，于都何氏廷仁、黄氏宏纲、其尤著也”。^①

除了在巡抚衙门、濂溪书院为弟子讲学，王阳明还带领弟子前往赣州名胜讲学，寓教于乐。正德庚辰（1520）八月，王阳明在平定“宸濠之乱”后的闲暇之时，在观心岩结庐讲学，收邹守益、陈九川等二十三人为弟子，史称王阳明“与海内名士讲学设社，教郡邑子弟歌诗习礼，岭北风俗为之一变”。^②讲学闲暇便与弟子、友人畅游通天岩，《静心录》中还记载了阳明及其弟子在通天岩赋诗五首：

通天岩

青山随地佳，岂必故园好？
但得此身闲，尘寰亦蓬岛。
西林日初暮，明月何来早！
醉卧石床凉，洞云秋未扫。

游通天岩次邹谦之韵

天风吹我上丹梯，始信青霄亦可跻。
俯视氛寰成独慨，却怜人世尚多迷。
东南真境埋名久，闽楚诸峰人望低。
莫道僧家全脱俗，三更日出亦闻鸡。

又次陈惟濬韵

四山落木正秋声，独上高峰望眼明。
树色遥连闽峤碧，江流不尽楚天清。
云中想见双龙转，风外时传一笛横。
莫遣新愁添白发，且呼明月醉深觥。

忘言岩次谦之韵

意到已忘言，兴剧复忘饭。
坐我此岩中，是谁凿混沌？
尼父欲无言，达者窥其本。

^①（清）黄德溥，崔国榜，褚景昕：同治十一年《赣县志》卷二十二《书院》，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53页。

^②（清）纪昀等著：《四库全书·中州人物考》，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此道何古今，斯人去则远。
空岩不见人，真成面墙立。
岩深雨不到，云归花亦湿。
坐忘言岩问二三子
几日岩栖事若何，莫将佳景复虚过。
未妨云壑淹留久，终是尘寰错误多。
涧道霜风疏草木，洞门烟月挂藤萝。
不知相继来游者，还有吾侪此意么？^①

同治版《赣县志》中也记载了王阳明及邹守益的赋诗：

游通天岩示邹陈二子
邹陈二子皆好游，一往通天十日留。
候吏来归久不至，我亦乘兴来寻幽。
岩扉日出云气浮，二子晞发登岩头。
谷转始闻人语响，苍壁杳杳长林秋。
嗒然坐我亦忘去，人生得休且复休。
採芝共约阳明麓，白首无慙黃綺俦。
邹守益通天岩诗
高筑琳宫引石梯，酒余客散自攀躋。
全来渐恐星河冷，话久不知烟雾迷。
白涧滩横舟隐见，翠微岩涌案高低。
浩歌初饱清秋与，何处东洲野店杂。^②

除却这上面七首诗之外，邹守益另有一篇题记和一首诗，周仲亦有一首诗刻于通天岩：

邹守益题记

^①（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之二《静心录》之八《外集二》。

^②（清）黄德溥，崔国榜，褚景昕：同治十一年《赣县志》卷四《山川》，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

安城邹守益、临汝陈九川，受阳明先生，闲左通天岩，阴晴变态，林霏异观，相与历览往古之踪，尽穷岩谷之胜，发秘扁名，升高望远，逸与不穷。客至，坐石咏殇，刻之洞口，陶然自适，不知天地之为大，而岩谷之非家也。凡浃旬而归。先是，游访者宪副王度、郡守丞盛茂、夏克义、邑令宋塔。同游者盱江夏良胜。游而信宿者刘寅、周仲、刘魁、黄宏纲、王可旦、王学益、欧阳德、刘琼治、王一峰也。正德庚辰八月八日。

邹守益题诗

此岩旧无题识，明水子扁曰：“潮头”，石曰：“莲舟”，东郭山人赋之。

巨灵翻苍溟，涌此潮头雪。

醉卧莲叶舟，长风棹明月。

正德庚辰

周仲题诗

吉水周仲扁此岩曰“观心”，有诗，九川书于石。

岩中豁豁仅容膝，日日观心面岩壁。

此心安得如此岩，鸟啼花落长虚寂。^①

从以上九首诗，一篇题记中可以看出，阳明及其弟子、友人常常在此逗留，阳明讲学闲暇，或独自，或领弟子、友人遍游通天岩。而王阳明于通天岩上赋诗六首可，如此之多的诗可见通天岩对其吸引力，他也爱极了通天岩。他在《游通天岩示邹陈二子》中写道：邹陈二子皆好游，一往通天十日留。候吏来归久不至，我亦乘兴来寻幽。从这首诗中，我们能体会到其弟子邹守益、陈九川二人在通天岩上游十天却依然兴趣盎然，这也吸引了王阳明再次前往通天岩“寻幽”且有“嗒然坐我亦忘去，人生得休且复休”的感叹。

通天岩究竟是有何东西吸引着阳明及其弟子，让他们对通天岩情有独钟。从诗句中我们或许能窥探一二。“四山落木正秋声，独上高峰望眼明。树色遥连闽峤碧，江流不尽楚天清。”通天岩如此美景，怎能不吸引阳明驻足观赏了？“意到已忘言，兴剧复忘饭”“嗒然坐我亦忘去，人生得休且复休”，静心忘我，亦是通天岩带给王阳明的另种感受。“俯视氛寰成独慨，却怜人世尚多迷”阳明从通天岩岩上俯瞰这景，独自感慨，世人大多迷失于尘寰之中。“坐我此岩中，是谁凿混沌？尼父欲无言，达者窥其本。此道何古今，斯人去则远。”世间大道

^①赣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丹崖悠悠：赣州市通天岩摩崖石刻集锦》，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0-32页。

究竟是什么，而勘破此大道的“达者”已“去则远”了。“不知相继来游者，还有吾侪此意么？”不知道后来者，还能有与我同样的感受吗？阳明于通天岩上的所思所想所悟，不仅是其有感而发，也是对其人生的一个小结。

在宋代对通天岩影响巨大的佛教，到了明代已不复过去之辉煌了。明初期从朱元璋开始，各代统治者都采取限制与利用的佛教政策，使佛教在可控制的范围内有序发展。到了明世宗嘉靖皇帝，采取与前代截然相反的政策，他竭力打压佛教，崇信道教，以至于出现了“世宗留心齐醮，置竺乾氏不谈，初年用工部侍郎赵璜言，刮正德所铸佛镀金一千三百两，晚年用真人陶仲文等议，至焚佛骨万二千斤”^①的情况。再加上当时佛教自身的缺陷，并未讲求众生平等，而是中分天下之人，佛教人才大量流失，黄宗羲曾有过这样的论述：

今之为释氏者，中分天下之人，非祖师禅勿贵。递相嘱付，聚群不逞之徒，教之以机
械变诈，皇皇求利，其害岂止于洪水猛兽哉！故吾见今之学禅而有得者，求一朴实自好之
士而无有。假使达磨复来，必当折棒噤口，涂抹源流，而后佛道可兴。^②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才有了“有明中叶，佛教式微已极……计明自宣德以后，隆庆以前，百余年间，教律净禅，皆声闻阒寂，全中土如此，不独滇黔然也。”^③

在明中叶佛教衰落期间，阳明心学横空出世，影响全国。尤其是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后，其思想学说渐趋成熟，巡抚赣南期间，经历宸濠之乱、忠、泰之变等打击，厚积薄发，其思想体系最终成型。并且在其巡抚南赣期间，讲学舍社，大力弘扬其思想，江西讲学之风兴盛，王学也迅速在江西传播开来，并波及全国。故有学者说：“先生勋名盛在江右，古今儒者有体用，无能过之。故江右……弁髦诸前辈讲解，其在于今，可谓家孔孟而人阳明亦。”^④

所以，明代通天岩佛教的色彩已逐渐淡化，成为王阳明讲学传播思想的重要场所之一，通天岩所蕴含的宣示教化之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3.3 教化与象征：宋代通天岩摩崖题刻与王阳明通天岩讲学活动分析

^①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释道》之《释教盛衰》。

^② (明)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三《泰州学案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③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④ 王上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江西》。

在我国古代，由于条件限制，系统的、正规的学校教育未能普及，在此情况下，“教化”作为一种化育民众的政策和手段，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教化”，将儒家伦理道德思想慢慢融化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起到巩固统治，维护儒家伦理道德的作用。关于“教化”的含义纷繁驳杂，江净帆为：教化也称风化、社会教化，是指统治阶层经过一定的价值施予和导向，使普通民众精神世界发生转变的过程。我国古代教化在其内容上以儒家伦理道德教育为主，糅杂了佛、道等多元思想；在其方式上，既包括系统、正统的学校教育，也包括渗入社会生活中，各种非正规的教育感化活动，两者共同在社会整体层面构成了一种整合性的教育影响力。^①

通天岩自宋以来，一直是赣州文化气息最浓厚的地方之一。从历代文化名人的游历题咏到士民的崇拜与建设，以及儒释文化的积淀，给通天岩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古迹，赋予了通天岩文化的魅力，而通天岩上的摩崖石刻则成为展示其魅力的载体。

宋明两代，通天岩所蕴含的文化意味和象征意义各有不同。宋代通天岩既是佛教胜地，又是一处具有儒家士大夫气息的文化之地，这二者的和谐共存，赋予了宋代通天岩别样的意蕴。到了明代，由于佛教的衰落，通天岩不再是昔日的佛教胜地，影响力也渐趋弱化。阳明理学的创始人王阳明曾在通天岩为弟子讲学，游景生情，情生所感，感有所得，使得通天岩在明代阳明学者心中成为一个儒学胜地。所以笔者试图从上宋代通天岩摩崖石刻以及王阳明于通天岩讲学的活动入手，分析通天岩所蕴含的内容，以及所包含的意义。

宋代通天岩上面的摩崖石刻有 56 品，其中北宋 28 品，南宋 28 品。在这 56 品石刻中有 19 品是佛龛题名（具体内容见第二章第二节佛教胜地的形成），足足占据了有宋一代石刻总数的三分之一。这 19 品佛龛题名中除却题有“明鉴题圣号铭”的 7 品之外，余下的皆为官员士绅所捐造。其中有 10 名官员捐造了佛龛，他们分别是：右司理参军蔡披，宣德郎虔州教授饶师传，西头供奉兵马监押任方，承奉郎知瑞金县事陆蕴，左司理参军张激，承议郎签书郎魏闇，提刑司检法官路口口，朝散大夫知州军事朱敏功等官员士大夫，通议大夫前尚书右丞张鬱；另外钱塘傅必成舍造一座，虔州赣县右通利坊朱氏同男吴豫舍造两座，以追召其亡夫和亡女能够受生净域。从佛教题名石刻的数量，以及捐造假龕塑像的主体来看，赣州本地官员士绅崇信佛教者不在少数。通天岩作为赣州佛教

^①江净帆：《“教化”之概念辨析与界定》，兰州：《社会纵横》，2009 年 1 月，第 1 期。

胜地，在赣州佛教徒心中的重要性就显而易见了。

有宋一代，佛教继续平稳发展，且世俗化程度进一步加强，大力宣扬忠君爱国和天下国家的思想。儒释道三教合一、禅净合一的思想成为主流，并奠定了宋代以后中国佛教的主要走向。佛教在众生平等和因果循环等主体理念和思想中，加入了符合中国特色的理念和思想：一，强调儒、释、道三教合一；二，佛教承认君权至上，乃至俯首称臣；三，僧侣承认中国本土以“孝”为核心的礼教传统并遵循实行；四，僧侣承认儒道及民间信仰具有同等的价值功能。这些思想和理念的加入，使得佛教日益世俗化、平民化。^①官员士绅作为佛教信徒的重要群体，由于其作为连接统治者与普通民众桥梁的特殊身份以及处于社会精英阶层的社会地位，他们对佛教的传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佛教的传播，使得这些思想慢慢改变着民众，教化他们心存忠君爱国之信念，自觉遵从伦理道德，从而起到巩固统治，维护儒家伦理道德的作用。

除却关于佛龛石刻之外，还有8品题字，都是诸如此类

李大正题字

通天岩 李大正书^②

刊工冯氏父子题名

石匠冯知古男冯绍^③

这些石刻内容单调，故参考意义不大。

余下石刻皆为题名、题诗和题记。宋代所刻的题名、题诗、题记中除却《陈进之等题名》是熙宁癸丑（1073）莆阳（今福建莆田）陈进之，率温陵（今福建泉州）林安节、杨子常、肖如晦、曾臣宝前来通天岩游玩时所留，此时的阳孝本还未在汴京（今河南开封）上庠。余下皆为阳孝本隐居通天岩后所刻。且其中内容关于拜谒、凭吊阳孝本的数量最多。北宋所留石刻，皆为阳孝本隐居通天岩之后，官员士绅仰慕其德高行先，主动去拜谒他的内容。如熙宁年间虔州知州林颜曾慕名而去，为阳孝本居所题“玉岩”二字，称其为“玉岩翁”，并

^①向世山：《从“圆觉经变”石刻造像论宋代四川民间佛教信仰的特征》，中华论坛，1995年第1期。

^②赣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丹崖悠悠：赣州市通天岩摩崖石刻集锦》[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6页。

^③赣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丹崖悠悠：赣州市通天岩摩崖石刻集锦》[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7页。

赋诗《□□玉岩翁》、《□步玉岩翁》和《林颜赠玉岩诗》刻于通天岩上。元祐年间的《王允升题林阳唱酬诗》更是揭示了其对阳孝本的钦佩敬仰之情：

奉酬□□朝请玉岩野人阳孝本上
六槐谁识是商岩， 皆见蟠龙卧碧潭。
未济苍生终有待， 独怀吾道且无惭。
从容咳唾成珠玉， 敏捷篇章出笑谈。
千载通天蒙所赠， 从今风月满江南。

家世中条旧素贫， 尘编堆积漫缤纷。
未甘末俗成虚老， 却叹劳生似逐群。
谁爱严陵溪上月， 独吟巢父岭头云。
闾阎莫怪衡门陋， 旌节曾来有使君。

□□□□礼处士徐稚， 旷千岁间乃有继其风者

林公今既知玉岩之贤， 见于负郭发于篇章以荣其隐。允升□□□之， 遂以倡酬刻于岩石。元祐□□□初七日， 乡贡进士王允升题。^①

这首诗已然将通天岩吸引他的原因所表明：阳孝本的才学、德行让他折服。这不仅仅是王允升的感受，也是后来者的心声。如若不然，就不会有诸如《魏贯道等题记》、《程宏靖等题记》、《玉岩亭记》、《胡榘题诗》、《胡榘题记》、《陈世雄题记》、《陈德符等题记》、《游瑾题记》等石刻的产生了，通天岩的吸引力也将大打折扣。

余下的题刻，大都为此类内容：

曾櫞题记

宝庆改元，良月既望，通守鲁郡曾櫞与客来游通天岩，时霜风清肃，晴日晏温，访古仰高，薄莫而还。

李文刊^②

^①赣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丹崖悠悠：赣州市通天岩摩崖石刻集锦》[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页。

^②赣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丹崖悠悠：赣州市通天岩摩崖石刻集锦》[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2页。

曾櫞在题记中提及来通天岩的目的是“访古仰高”，虽不知曾櫞访古仰高的对象是谁，但瞻仰阳孝本的故居，参拜山中古寺，必是其游览内容。

从宋代摩崖石刻中可以看出，前往通天岩揽胜、拜谒、凭吊阳孝本的皆为官员士绅，而这一群体与政坛联系密切，并且在阳孝本隐居通天岩后，朝廷对其征召过，他也重新入仕。这说明阳孝本与当时的政坛互动较多，且联系紧密。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一方面，政府对待隐士宽松的政策和对其比较尊重。政府常常征召并嘉奖一些有节操、有声望的隐士，鼓励他们回归并参与到现实政治中，并且给予不愿意出仕为官的隐士以最大的宽容和自由；另一方面，宋代隐士对待现实政治的回应也是比较积极的。他们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国忧民的意识，而且与宗教联系密切，淡泊名利、安贫乐道、潜心向学，授业解惑是他们的生活状态和特征，期望通过这种生活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同样在道德实践上，他们也具有重孝道、与兄弟族人和睦友爱、行义推于乡里的高尚品质，且为世人所推崇。

隐士以其自身高尚的品德影响着周围人以及后来者，同时通过政府的宣扬和提倡，让与之交往社会精英阶层能够感受到统治者的宽厚与礼贤下士和隐士所具有的忠君爱国思想。作为北宋时期著名的隐士，阳孝本在其隐居的通天岩用自己的行动及高尚的品德影响着士人，教化着他们，而通过政府的征召以及将阳孝本写入《宋史·隐逸》中，扩大了阳孝本的影响，使得更多的士人往来通天岩，追寻他的足迹，感受他的德行，在潜移默化中去教化这些士人。

所以，有宋一代，通天岩上不仅有佛教的教化，还有儒家隐士阳孝本的德行教化，寓儒于佛，佛儒交融，形成了通天岩所蕴含的独特教化内容。明代通天岩却有着区别于宋代通天岩的意义。

宋代通天岩上掀起的修建佛龛的高潮到了明代已然销声匿迹，这从摩崖石刻的数量中就能看出。宋代关于兴建佛龛的题名石刻有19品，明代却一品也没有，佛龛的修建更是在明代销声匿迹。明代通天岩的佛教影响力以及教化功能已经减弱。阳孝本的故事对明代士绅的吸引力大为减弱，在明代通天岩所存石刻中，少有诗篇来感怀杨孝本了，取而代之的是王阳明对他们的吸引。

王阳明在南赣任巡抚期间，不仅平定了横跨四省、延宕数十年的乱事，镇压了宸濠叛乱；而且注重地方教化，平叛期间，实施十家牌法，整顿原本杂乱无章的地方民政，乱平后，颁布《南赣乡约》并将其付诸实践，兴建社学，修

复并建立书院，亲自讲学，使得地方弦歌不辍，民心向化。

王阳明在南赣推行“教化”的另一个重要措施，就是结舍讲学，宣扬心学。除了在巡抚衙门，以及正德十三年（1518）在新建的濂溪书院讲学之外，他还在正德十五年（1520）带领其弟子邹守益、陈九川等人于通天岩结舍讲学。“先生与东廓邹子再见阳明于虔，进授良知之训，遁居通天岩。”^①“益再见先师于虔，与明水陈子切磋通天岩中”^②。阳明在通天岩中给邹陈诸子讲授其良知之训，并让他们互相切磋学问，理解良知之真义。王阳明这次通天岩讲学，是他离开赣州前讲学时间最长的一次，“凡浃旬而归”^③。

在邹守益留于通天岩上的题记中，记载了这些人与阳明一道前往通天岩：先是，游访者宪副使王度、郡守丞盛茂、夏克义、邑令宋瑢。同游者盱江夏良胜。游而信宿者刘寅、周仲、刘魁、黄宏纲、王可旦、王学益、欧阳德、刘琼治、王一峰也。正德庚辰闰八月八日。^④在这些同游者中，邹守益、周仲、黄宏纲、欧阳德以及陈九川皆为其弟子。这只是邹守益在题记中记载下来的阳明弟子，实际上来此的阳明弟子数量远不止此几人。这些弟子中庐陵籍的邹守益、于都籍的黄宏纲、临川籍的陈九川名满天下，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得阳明心学之真传，更重要的是他们对阳明心学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作为青原讲会的首倡者以及复古书院的主要建设者，邹首益对王学在吉安得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徐阶认为邹守益在吉安府传播江右王学对当地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的改善：

在嘉靖初，其学已信于人，田夫市侩，时其讲说，驱而听之，惟恐或后。识者谓公大用，即古风动之化，殆可庶几。^⑤

徐阶认为邹守益的学说不仅取信于“田夫市侩”，而且大大改善了当地的社会风气。于社会教化有很大的帮助。

赣南籍的江右王门子弟，以何廷仁、黄宏纲最为出名。罗洪先曾说：

^① 《明水陈先生文集》卷首，江西图书馆藏清抄本，第819页。

^② (明)邹守益：《邹守益集》卷三《明水陈姻家寿言》，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108页。

^③ 赣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丹崖悠悠：赣州市通天岩摩崖石刻集锦》[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1页。

^④ 赣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丹崖悠悠：赣州市通天岩摩崖石刻集锦》[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1页。

^⑤ (明)邹守益：《邹守益集》卷二七《明故南京国子监祭酒礼部右侍郎溢文莊邹公神道碑铭（徐阶）》，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1380页。

嘉靖戊子余记偕北上求友，四方咸曰：君不闻，阳明之门所评乎，“江有何黄，浙有钱王”。盖指零都有何善山山秦、黄洛村弘纲与绍兴钱渚山宽、王龙溪畿也。^①

以何廷仁、黄宏纲为代表的赣南江右王门弟子，在赣南传播王学，影响深远。在其去世之后，有一批学者以其为师，传其学术，且乡绅建有濂溪、阳明、善山三先生祠并有祠田，“皆乡大夫袁君沂、周君文、胡君夷简、予先族祖乔、崇等营度之。诸君子复为之期，率诸后进诣新建、善山两祠，以其讲之何、黄诸公者，讨论而服习之。”^②

虽然后来吉安等地的王学传播远比赣南地区发达，但以何、黄为代表的赣南江右王门群体的出现，使得赣南地方文化在明中期以后成为“息马论道过化最久之地”^③。

临川籍的陈九川回抚州之后也在抚州大力宣扬王学，“先生归抚，倡学益力，抚士始知有圣学”^④。

明代的通天岩是不仅是王阳明在赣南地区的重要讲学之地，将其“致良知”思想传授给弟子，让弟子们自己切磋学问，感悟思想，而且也是他宣扬其阳明心学的重要场所。阳明弟子亦遵从阳明教诲，在地方通过讲学、修建书院等活动，传播王学，一方面使得王学盛极一时，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当地的社会风气，教化了士民。所以，通天岩成为明代阳明心学传播的重要地方。

总之，宋代通天岩因佛教和阳孝本，使其蕴含了教化之意；而明代通天岩则成为成为阳明心学的重要传播之地。

^① (明)罗洪先：《念庵先生文集》卷八《明故承德郎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善山何君墓志铭》，嘉靖四十二年本。

^② (明)李涞：《前明李中丞养愚先生文集》卷上：《濂溪、阳明、善山三先生祠田记》，赣州图书馆藏本。

^③ 张位：《重修王文成祠记》，同治《赣州府志》卷 11《祠庙》。

^④ 《明水陈先生文集》卷首，江西省图书馆藏清抄本，第 819 页。

第4章 回归本位：清代通天岩角色的转变

由于清代赣南社会已由“化外”转变为“化内”，社会情况的变化导致通天岩在宋明时期所蕴含的特殊意义，在赣州所扮演的的特殊角色和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到了清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清代的通天岩已然回归本位，成为赣州一处郊游胜地。

4.1 清代赣南社会的变化

唐宋至明清时期，赣南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由于流民的进入，他们会同本地土著共同开发“地旷人稀”的赣南，使得赣南逐步得到开发，经济迅速发展，社会风气也较前代有了很大的变化；二是由于中原王朝的统治加强，“国家”意识逐渐被树立起来，赣南逐渐从一个“化外之地”转变成“化内之地”。

4.1.1 清代赣南经济社会的变化

明初赣南地区开发较少，一直被官员与文人认为是“地旷人稀”，曾任石城训导的杨士奇就形容说：

赣为郡，居江右上流，所治十邑皆僻远，民少而散处山溪涧，或数十里不见民居。里胥持公牒征召，或行数百里不底其舍，而岩壑深邃，瘴烟毒雾，不习而冒之，辄病而死者常什七八。江水险急，滩石如虎牙森立。……以是会府视之，于赋役百需，常半减他郡。^①

杨士奇所描述的赣南地区完全是未开发的山区景象，环境恶劣，“瘴烟毒雾”，并且人口稀少，“或数十里不见民居”。这种情况在明中后期逐渐得到改变。

明代中期以后，控制基层社会的里甲体系逐渐崩溃，大量原属于里甲编户的普通民众逃亡到各地，形成了大规模的流民运动，并一直持续到清初。而赣南由于“地旷人稀”，成为明清流民的重要聚拢安家之地。流民的到来，使得原本人眼稀少的赣南山区得到开发，特别是万历以后，随着赣闽粤边区社会动乱的平

^① (明) 杨士奇：《送张玉鸣序》，《东里集》，文集卷6，四库本。

息，人口得到恢复，逐步改变了赣南地旷人稀的生态格局。

明清交替之际的战祸打乱了正在恢复过程中的赣南，大量人口或损失与战乱中，或逃往外地。在顺治三年（1646）参藩岭北的金震出见到了如是情景“赣民才遗十无一二，而强兵悍卒持刃拷诘财物，横肆杀戮……城内外白骨成邱，横尸塞路”。^①南安府的人口也在战乱中损失严重，“国朝顺治三年定南安。四月初十日，大兵临城，其民间有死难不屈者。师旅之后，继以凶疫，郡户口自是渐凋耗云”^②。万历年间，南康县有人丁10404丁口，但经过战乱，到顺治十一年（1654）却只有“题准开除逃亡人丁妇女6171丁口”^③正如乾隆版本的《南康县志》所载：“田地荒芜者十之六，人之逊亡者十之七。”^④人口损失如此之大，清政府不得不采取鼓励垦荒的政策，一方面吸引人口来赣南，以此来填补因战乱而损失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加速赣南的开发，巩固其统治。

在这一背景之下，赣南官员纷纷招徕流民。在同治《赣州府志》中关于郎永清的传记中就这样记载：“顺治九年擢知赣州府。赣当明季户籍十万八千，丙戌城破，存者三千户。闽广连岁用兵，诸军入广者必道赣，民相率徙避。永清勤招徕，严约束，复业者日众。”^⑤这是赣州府最高一级的官员的招徕活动，此时下辖各县也大都以此为工作重点。会昌县，“鼎革后城市人烟甚稀，（王）洵招徕抚集”^⑥。南安府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招徕流民活动，康熙十六年（1677），白启明“由举人守南安，招徕流民垦辟荒芜”^⑦。政府不仅鼓励招徕流民，而且还实行优惠政策，保护流民垦荒果实和积极性，据同治版《赣州府志》记载：

鼎革时，南赣破兵，田粮食不可科征。后稍稍复业，江西巡抚蔡士英请分别荒熟，熟则归民，荒则归官。其新熟者，以顺治二十年起科，至届满时。藩司某惧不耕之田速归官而民失业也。言于江抚郎廷佐，行檄编派民户不即输者，亦以赣营兵饷抵兑。兵民凶惧，未垦之田皆愿入官。赣守郎永清、南安守胡顺忠，各俱文详情。佟抚遍询僚属，（史）燧请立三册：已垦完粮为一册，无主入官为一册，有主愿入官为一册。而以荒田归并屯官，听其开垦，民免虚赔之累。^⑧

^①（清）魏瀛等修，钟音鸿等纂：《赣州府志》卷41《统辖名宦》，同治十二年刊本。

^②（清）石景芬等修：《南安府志》卷29《事考》，同治七年本。

^③（清）沈恩华等修：《南康县志》卷3《食货·赋役》，同治十一年本。

^④（清）乾隆《南康县志》卷2《风俗》。

^⑤（清）魏瀛等修，钟音鸿等纂：《赣州府志》卷42《府名宦》，同治十二年刊本。

^⑥（清）魏瀛等修，钟音鸿等纂：《赣州府志》卷43《县名宦》，同治十二年刊本。

^⑦（清）魏瀛等修，钟音鸿等纂：《赣州府志》卷41《统辖名宦》，同治十二年刊本。

^⑧（清）魏瀛等修，钟音鸿等纂：《赣州府志》卷41《统辖名宦》，同治十二年刊本。

由于政府的鼓励和支持，赣南流民运动的规模更大。清代流民将烟草、花生、甘蔗等经济作物带入赣南，不仅使得山区的开发规模和速度加快，而且直接促进了赣南规模宏大的经济作物区和经济林区的形成，从而奠定了今天赣南的农林生产格局。

建立在山区开发和经济作物普遍种植基础上，赣南山区村落增多，人口增加，一改“地旷人稀”的景象。根据黄志繁教授的研究，清代赣南的开发促使墟市的数量也大为增加，墟市也逐渐繁荣起来。而墟市的数量增加和市场的繁荣，是市场体系趋于完善和成熟的表现。^①

除却赣南经济逐步发展之外，赣南的社会习俗亦有很大改变。而社会习俗的转变不仅是经济与文教综合发展的结果，更是区域社会变迁的深刻表现。

明清之前，赣南地区未得到有效的开发，今人常常称之为“化外”之地，宋朝名臣李纲就曾这样形容虔州民风：

虔民赋性犷悍，善于为盗，易为结集，动以千百为群，凌逼州县，不畏刑法，不顾死亡，循习成风，异于诸路盗贼。^②

北宋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改革家李觏也曾说过：

南川自豫章右上，其大州曰吉，又其大曰虔，二州之赋贡与其治讼，世以为剧，则其民口众多可识也。虽然吉多君子，执瑞玉，登降帝所者接踵，虔无有也。疑其偷南越，袭瘴蛊余气，去京师愈远，风化之及愈疏，乘其丰富以放於逸欲，宜矣。^③

到了明清，特别是清代，赣南的社会风气则有了巨大的改观。同治《赣州府志》就这样记载：

昔人于赣州学记，往往谓赣之地负险蔽奸，赣之人为盗好讼。今以予观之，则大有不然者。何哉？盖其渐被于国家玉帛之鼓钟之化，熏陶于圣贤诗书礼乐之林，有以化其武健之风，而涵夫文明之教，故文物衣冠后先蔚起，清淑之气磅礴郁积，焕乎与中州比隆，而

^① 黄志繁：《“贼”“民”之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11页。

^② （宋）李纲：《梁谿集》卷82《表札奏议四十四》，《论虔州盗贼札子》。

^③ （宋）李觏：《虔州柏林温氏书楼记》，《李觏集》卷23，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风俗之质朴，民情之刚直，反甲于他郡焉。^①

从上面记载可以看出，经过数百年的开发和教化，宋时赣南那种“野蛮民风”，到清时已然改变，取而代之的则是“风俗之质朴，民情之刚直，反甲于他郡焉”。

4.1.2 清代政府在赣南地区统治的深化

清代沿袭了明中后期以来的动荡局面，各种“盗乱”频繁发生。流民进入赣南的高潮是在清初，随着流民的大量涌入，清初赣南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矛盾凸起。一方面是生态上的变化，赣南山区过度开垦，水土流失严重，资源枯竭问题开始凸显，且与生计问题互为恶性循环。饶伟新教授对此有深入的分析，他认为：“明清之际，随着闽粤移民的大规模佃垦和新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赣南的山区开发和乡村经济较明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不过，在传统的农业技术条件下，由于山多田少、无节制的山区开发造成的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以及经济作物对粮田的占用、人口压力的增加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赣南乡村经济及居民生业总体上仍然十分贫弱，粮食供给严重不足，人们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加深，主佃之间围绕土地收益分配而展开的矛盾冲突日趋激烈。”^②自顺治二年（1645）石城吴万乾纠集佃户，组织田兵以后，赣南东部的宁、石瑞金和中部的于都、兴国等地佃户和田主之间的斗争此起彼伏，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于都抗租斗争被镇压后，始有停息。然而佃农抗租的流风余韵仍然延续至清中叶，道光年间宁都直隶州仍然有“此风今犹未息，偶遇荒歉，则奸民私立议约，预定租额，更狡猾不令田主知主议人姓名”^③的情况。这种抗租、抗佃的暴乱，表面上是佃农与地主之间的矛盾，实质上，这种暴乱损害了国家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威胁其统治，而国家从来对于具有这种威胁的动乱，往往是毫不手软坚决予以镇压的。关于这一点，学者刘永华就有十分精辟的论述：

在一些主佃关系相对缓和的地区，地主可以在乡村设立粮仓。……他们在乡间还有代理人，帮助他们催收租谷。但是，在主佃关系相对紧张的时候，在城市的地主只好依赖

^①（清）同治《赣州府志》卷23《经政志·学校》，引（清）魏瀛《重修赣州府学记》。

^②饶伟新：《生态、族群与阶级》，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193-194页。

^③（清）黄永纶、杨锡麟：《宁都直隶州志》卷14《武事》，道光四年本。另乾隆十九年（1754），宁都升为直隶州，石城、瑞金二县隶之。

于国家了。……在收租方面，国家与地主的立场是一致的，因为只有在地主收到租谷后才有可能完成国家的税收任务。因此，主佃关系尖锐化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导致了国家的介入，而国家的介入，使抗租（主佃）关系有可能转化为叛乱（乡民与国家的关系），导致国家的干涉、镇压。正是这些抗租的“顽佃”冲击了田主站在同一边的政府官员后，“顽佃”才变成了“匪徒”、“匪党”。因此，地主的大量出现，不仅将佃农置于地主的剥削之下，置于商品经济的侵蚀与价格的波动之下，而且由于田主与国家的结盟，将之置于国家的对立面。^①

另一方面，流民的进入改变了赣南流民与土著居民之间的力量对比，流民开始成为赣南社会的主要力量，流民的“地著”必然带来流民的“土著化”问题，而流民的“土著化”则又在有限的生态资源条件下，构成对土著居民的竞争与挑战，因而土著居民与流民之间的矛盾出现并日趋深化。乾隆《上犹县志》中的记载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盖自甲寅蹂躏三载间，土人庐墓焚掘几遍，屠杀绅士百数十人，掠卖子女不下数千。平民死者尸横遍野，有阖族俱歼者，如象牙湾朱氏，浮潮李氏，周屋围周氏，石溪之王氏、杨氏，水头之胡氏、游氏，无一存者。^②

清代赣南地区出现的社会动荡，给国家的行政管理和赋役征收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给统治的稳定造成了极大威胁。因此我们可以说，国家推进对赣南地区的管理既是主动，亦是被动。主佃矛盾、土客矛盾导致“国家”观念在赣南地区的弱化。为了加强统治，政府一方面招徕流民，将其转为编户齐民，身份上的转变既能增强其地域归属感，也能加快地方社会秩序的构建和赋役制度的恢复；与此同时，毫不手软的镇压一些比较大且颇有影响的叛乱，摧毁其在民间的根基和威望，树立起官府绝对权威的形象，增加中央王朝“保家安民”的信心。

与此同时，在大量设县的基础上，继续实行明朝的里甲基层组织，并允许民间家族组织的发展。根据郑振满教授的研究，最迟至明代中叶起，家族组织已直接与里甲制度相结合，演变为基层政权组织，郑振满认为，明清时期国家

^① 刘永华：《17至18世纪闽西佃农的抗租——农村社会与乡民文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

^② (清)蔡泰均：《上犹县志》卷十《杂记》，乾隆五十五年本。

统治体制，经历了从直接统治向间接统治的转变，体现了“基层社会自治化”的倾向。^⑨清代赣南，几乎每个家族会在家规中强调国家赋役的重要性，家族组织成了国家与地方社会的重要中介力量。通过这一基层行政组织，在维护社会秩序和统治的基础上，大力推行学校教育，控制地方神灵以及旌表模范人物等一系列教化内容，从而向基层民众灌输“国家”的概念和意识形态，使他们在接受“正统”的儒家伦理道德教育时，也逐渐接受“国家”的统治。^⑩

正是由于政府对赣南地区控制的加强，民众对于“国家”概念的理解和接受，赣南地区逐渐从“化外之地”转变为“化内之地”。

4.2 角色转变：郊游胜地

清代赣南从“化外之地”转变为“化内之地”，^⑪儒家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渐入人心，“赣弟子颇聪颖，间有一二从事干谒者，必众耻之，故士多键户，读书畏谨自爱”“冠礼，赣雩缙绅家多行之”。^⑫在此背景下，通天岩所蕴含的教化意义自然减弱。

仁者爱山，智者乐水。清代士人登通天岩，游通天岩，已然成为一种亲近自然，瞻仰先贤的休闲放松方式。《廖寅游通天岩诗序》写道：

余巡南赣之明年，乙丑春正月廿七日公暇，偕姜君少川、郡君宝篆、甘君煦堂、袁生骈之，肩舆出郭，渡章水而西，问所谓通天岩者，往而游焉。

是日也，春初日霁，山翠若屏。由村落阡陌间，逶迤盘折而上。至则翠野翁翳，林谷深邃，花香鸟语，仿佛别有员峤，乃下肩舆。披蒙茸，陟蹬道，谒玉岩之像，读苏公之赞、望壁刻兜罗诸佛，周辱颜百尺间。由龙虎岩折而西，出洞天至忘归岩，诵阳明先生题咏及诸前人石刻，流连久之。乃拾级而上，至翠微岩绝顶，履元武殿。凭栏远眺，稍憩而休焉。余谓诸君，此地去天尺五；今日之游，可谓造极登峰矣。然非得一日闲，则不能至；即不尽一日之力亦不能至，今幸而得至，至而获憩于斯矣，可漫然已乎？余观石勒古文人游历皆各有题咏以纪。而就中阳明先生作，尤脍炙人口，诸君盍此韵焉。皆相顾若逊谢。余复

^⑨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第242-271页。

^⑩ 邹春生：《王化和儒化：9-18世纪赣闽粤边区的社会变迁和客家族群文化的形成》，博士学位论文，2010。

^⑪ 参看邹春生：《王化和儒化：9-18世纪赣闽粤边区的社会变迁和客家族群文化的形成》，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⑫ (清)魏瀛等修，钟音鸿等纂：《赣州府志》卷20《风俗》，同治十二年刊本。

曰：以阳明先生之功业、文章，人皆知其不可及矣，而为诗必欲及之则惑已甚。且先我而至，至而和阳明先生韵者不少。今日纪游之作，见浅见深，各因一时意兴所及，以无戾于前人，当亦阳明先生之所许也。诸君又何逊乎？乃相视而笑，因携手下斋僧饭。方薄暮而返。一路诵阳明诗，至“明日何来早”句，窃怅怅叹归途之速，然回忆所游，又觉洞中之日长也。比及江干，日暮云归、渔火隐见，视诸所游历，则隐隐青螺在碧云飘渺间矣。既归，篝灯为诗，而诸君亦先后和阳明先生韵，以属于余。此次之订游者，余也，因为之记。并附各和韵诗于后。^①

从这篇诗序中我们可以看出廖寅及其友人抽闲暇之余，前来游览，“然非得一日闲，则不能至”。他们为了到通天岩不辞辛苦，“肩舆出郭，渡章水而西，问所谓通天岩者，往而游焉”先是坐肩舆，而后乘舟，再询问路径，显然是慕名而来。至通天岩时，见“翠野翁翳，林谷深邃，花香鸟语，仿佛别有员峤，乃下肩舆”，廖寅等人被通天岩之美景所吸引，下肩舆，步行上山，谒阳玉岩之像，读苏轼之赞、望壁刻兜罗诸佛，诵阳明诗，忆阳明之文治武功，仿阳明之风题诗留刻，乐在其中。不知不觉天色已黑，归途中感叹“归途之速”，回望薄暮中的通天岩，犹如“隐隐青螺在碧云间飘渺”。通过廖寅的游记，我们能感受出他及其友人在游通天岩时的惬意，归来时的依依不舍。

通过廖寅等人在通天岩的题诗，我们能够更加清楚的了解他们游通天岩时的心情：

今日天气佳，出郊云更好。携我素人心，著履游仙岛。

花香鸟语新，春到何太早。由来洞中天，云深常不扫。（邻水廖寅复堂）

桃源何处寻，即此云岩好。山空人迹寻，飞身入蓬岛。

悠然太古心，忘却归途早。回首白云封，洞门深未扫。（会稽姜颐少川）

先贤游赏处，极目风光好。别有一天园，宛似群仙岛。

山高鸟寂疏，天近春来早。无处觅陶童，三径呼谁扫。^②（山阴邵钰宝篆）

三首诗中各有这样的诗句：“著履游仙岛”、“飞身入蓬岛”、“宛似群仙岛”。将通天岩

^①（清）魏瀛等修，钟音鸿等纂：《赣州府志》卷4《山》，同治十二年刊本。

^②赣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丹崖悠悠：赣州市通天岩摩崖石刻集锦》，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9-60页

形容成“仙岛”、“蓬岛”和“仙岛”，可见他们对于通天岩风景的赞扬。

蹑足履巉岩，古洞春风好。我疑上蓬莱，簌簌花生岛。

天气午晴初，登临时尚早。何事竟忘归，但来云不扫。（邻水甘家春煦堂）

扰扰出尘寰，始觉山林好。丹崖万丈梯，天风来海岛。

倚身忘归岩，却笑归途早。洞云想更幽，莫逐秋风扫。^①（宜春袁芳疎骈之）

“何事竟忘归”、“却笑归途早”两句诗，表现出廖寅及其友人在通天岩上流连忘返，以至于忘却了时间。

被通天岩美景所吸引的不止廖寅及其友人，在通天岩的题刻中，许多士人留下的诗刻都流露出对通天岩美景的赞美与喜爱。如刘次焜的题诗：信步入天台，层层丘壑好。青山即画图，卷石亦蓬岛。红日与肩齐，白云出岫早。刘阮归未归，花落春风扫。^②张象瑛的诗这样写道：探幽到洞天，竟唱人间好。山石足怡情，烟霞常满岛。白云得秋多，红日穿崖早。使我意忘归，凡尘风自扫。^③陈儒的题诗虽为直接描写通天岩的美景，却能在字里行间感到他的喜爱：我归心不归，心与境俱好。自笑出狂花，寻胜入空岛。自笑出云山，竟比诸君早。何日共梅花，静把蓬门扫。^④

通天岩清代所存的 16 品题刻，除却廖寅等人所留下的一品游记题刻之外，另有类似廖寅题刻内容的《连文仲游通天岩记》一品，类似廖寅等人题诗内容的八品，余下六品为：一品题记，一品联句，一品题名，一品碑记，两品题字。

另外同治《赣州府志》中亦记载了两篇游览通天岩的游记以及十三首诗歌。游记为《刘谦游通天岩记畧》、《邱成和游忘归岩记》，这两篇游记的内容皆与《廖寅游通天岩诗序》内容相似，表达出对通天岩人文自然美景的称赞。十三首诗歌中既有写景诗，描写通天岩的景色之美、历史之悠久，也有借景寓情，表达出对通天岩的喜爱。^⑤

^①赣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丹崖悠悠：赣州市通天岩摩崖石刻集锦》，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 年 9 月版，第 60 页。

^②赣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丹崖悠悠：赣州市通天岩摩崖石刻集锦》，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 年 9 月版，第 68 页。

^③赣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丹崖悠悠：赣州市通天岩摩崖石刻集锦》，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 年 9 月版，第 69 页。

^④赣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丹崖悠悠：赣州市通天岩摩崖石刻集锦》，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 年 9 月版，第 63 页。

^⑤（清）魏瀛等修，钟音鸿等纂：《赣州府志》卷 4《山》，同治十二年刊本。

除却上面所提及的以纯粹旅游的目的来通天岩放松心情，欣赏美景的游客之外，还存在游客以另外的一种方式来游通天岩：

通天岩，郡人阳玉岩先生之读书堂也，先生行谊文章，卓然有名于宋室。同时如杨龟山、苏玉局、蒲传正，异代如王文成公辈，咸心折焉。后因其堂建为寺，以奉佛印。于其旁为祠，以祀先生。由宋迄今，七百有余岁。盖桑梓之敬先生者，非一日矣。岩顶有真武阁，阁之前曰谢窝坑。堂叔紫庭先生奉二伯祖母陈太恭人葬焉。阁之后曰长古坑侯姑形。予奉先妣张太孺人葬焉。岁时蘸扫，必归岩下往往而归。主持僧理常为东道主焉。紫庭叔谓余曰：佛家自如来入舍卫城乞食，其法嗣皆以十方布施而得食。吾叔侄以在家人而祭，扰出家人香口，固已非矣。况每年蘸扫，原爰而来乎！顾僧曰：岩之前后，余二家先人窀穸之区也。每年展墓，必一二次来。今者侨居郡城，午至即可以来归第。然二家子孙仍归故里，则春秋拜扫住宿之留必在宝山，请以薄田助香火，兼为异日旅食资可乎？僧曰：诺！紫庭叔因捐坟前谢窝坑、罗边、西坑尾、禾炮坑四处田租共十一石三斗五升。予亦捐坟右石桥坑、焦子坑、三块坪、马鞍岭四处田租十三石三斗四升五合，皆给印契与主持僧理常执掌，永为香火费。郡学博周君步驤为之记，已登入赣县之志矣。岁丙戌，余堂弟仁恩等，后奉紫庭叔葬于岩前谢窝坑，盖此地因已三坟矣，未及十年，而人事代谢，今者之盛可胜言哉。予思佛门无诳语，后此一二日之羁栖，在山僧必无违言，第以二家子孙上坟面见松卧，固当瞻风水而深其仁人孝子之盛耶。游斯岩而谒先生之祠，亦当寻旧迹而溯风微，访先生之行谊文章以自励，则矜式之情，未必不足于一日之羁栖，悠然而生也。是为记。

道光六年岁次丙戌十二月吉旦于都候补教谕谭锦撰。^①

因通天岩是“宝山”，故谭锦母亲葬在此地，后谭锦的堂叔紫庭先生奉二伯祖母、紫庭先生本人亦葬在通天岩。每年春秋来通天岩扫墓，且捐田租助香火。从这件事情中可见谭锦之孝道，“固当瞻风水而深其仁人孝子之盛耶”更反映了儒家的孝已然深入人心了。可见因孝扫墓是谭锦来通天岩之第一目的。

“则春秋拜扫住宿之留必在宝山，请以薄田助香火，兼为异日旅食资可乎？僧曰：诺！”，从这一材料中，我们可以读出两个信息：一，春秋扫墓完毕之后，第二日游览通天岩；二，香客可付香火钱，在寺中食宿。拜祭完毕后，谭锦则会游通天岩，拜谒阳孝本。但这种游览的方式在相关史料中的记载以及现实生

^①赣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丹崖悠悠：赣州市通天岩摩崖石刻集锦》，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61-62页。

活中甚为稀少，因此，此这类因上坟而游览通天岩的游客毕竟是少数。

清代的通天岩，早已没有了宋代通天岩时兼具教化之地、郊游胜地的多种功用，亦无明代通天岩对阳明心学如此之大的影响与作用，剩下的只是作为一处名山对人们的原始的吸引力了。

第五章 结语

历来学者在讨论中国大一统社会形成的问题时，比较少去重视佛教的作用，学者们往往更加重视儒教的作用。科大卫与刘志伟认为，明清时期，宗族在南方地区成为沟通地方社会与国家之间的重要桥梁，而宗族的发展实践，则是宋明理学家利用文字的表达、改变国家礼仪，在地方上推行教化，建立起正统性的国家秩序的过程和结果。^①赣南的研究亦不例外。黄志繁认为赣南地区从“化外之地”向“化内之地”转变过程中，以儒教为核心的教化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②饶新伟也认为儒教文化在赣南地方社会从移垦社会向定居农业社会转变过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③最近卜正民的研究揭示出佛教与士绅之间其实有非常复杂的关系：佛教一直在士绅和国家权力之间扮演或隐或现的角色。^④宋代通天岩同时成为阳孝本隐居地和佛教胜地的事实，也表明佛教与士绅宣扬的文化之间有和谐共处的空间。宋代的通天岩成为赣南教化中心的事实也表明，佛教和名山大川在地方社会接受正统“教化”的过程中也曾经扮演重要角色，尽管所谓名山胜地在这一历程中所起作用更多是宣示“教化”的象征意义。

随着中国大一统历史进程的推进，名山胜地这种教化宣示色彩逐渐褪去色彩通天岩清代逐渐回归为赣州郊游胜地的事实又表明，在早期地方社会中，名山胜地可以扮演“教化”的象征，但随着教化的逐渐推广，区域社会逐渐被纳入王朝统治范围，它们在区域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会发生变化。仔细考察城市郊区的许多名山胜地，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演变轨迹具有一定的共性。

^①参看：（英）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载于《历史研究》，2000年第03期）；柯大卫：《国家与礼仪：宋至清中叶珠江三角洲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载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②黄志繁：《“贼”“民”之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③参看饶伟新：《生态、族群与阶级——赣南土地革命的历史背景分析》（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明代赣南的移民运动及其分布特征》（载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明清时期华南地区乡村聚落的宗族化与军事化——以赣南乡村围寨为中心》（载于《史学月刊》，2003年第12期）。

^④卜正民著，张华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致 谢

转眼之间，三年韶光已渐行渐远，回首望去，收获颇多，感触颇多。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黄志繁教授，正是由于他的教导和督促，才使我这三年时间学习了以前从未接触过的知识，但由于资质愚钝以及用功程度不够，未能达到老师的期望，着实感到惭愧。在毕业论文写作期间，老师又不厌其烦的指导、修改，从论文结构是否符合逻辑到字词语句是否通顺，老师倾注了大量心血，才使得我的毕业论文得以顺利结稿。研究生阶段，能够遇上如此良师，实属我之幸运。

同时，我要感谢研究生阶段所遇到的诸位历史系的老师。他们以渊博的学识和平易近人的态度在专业学习上给予了许多支持和帮助，更以自身的人格魅力感染、启迪着我。

三年时光中，有幸遇上了董律、张立羊、宋恺明、张凯乐、李世珍、王吉隆、雷超、王建雄、夏铭、张学禹、易红等同窗好友。感谢他们陪我一同度过这三年的大好韶光，感谢他们在我遇到困难时的援助之手。能够认识你们，实乃我之荣幸。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妹妹以及曾经的她，正是由于他们无私的支持和鼓励，才能让我有继续前行的动力，使我全身心的投入学习。

杨新

2013年5月于南昌大学29栋公寓

参考文献

一、正史政书

- [1] (元) 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 1997年。
- [2] (元) 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 1986年。
- [3] (清) 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 1974年。
- [4] (明) 李贤等:《明一统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5] (明) 中时行等修,赵用宝等纂:《大明会典》,续修四库本。
- [6] (清) 和珅等修:《钦定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五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二、文集

- [1] (宋) 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 1986年。
- [2] (宋) 余靖:《武溪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 (宋) 王安石:《临川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4] (宋) 邹浩:《道乡集》,钦定四库全书本。
- [5] (宋) 李纲:《梁谿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6] (宋) 罗大经:《鹤林玉露》[M]北京:中华书局, 1983年。
- [7] (宋) 李觏:《李觏集》[M]北京:中华书局, 1981年。
- [8] (宋) 程颢、程颐撰,朱熹编:《河南程氏外书》,清光绪三十四年刻本。
- [9] (宋) 余靖:《武溪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0] (明)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 [11] (明) 罗顺钦著, 阎韬点校:《困知记》[M]北京:中华书局, 1990年。
- [12] (明) 杨士奇:《东里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3] (明) 王士性:《广志绎》[M]北京:中华书局, 1981年。
- [14] (明)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2年。
- [15] (明) 邹守益:《邹守益集》,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7年。
- [16] (明) 邹守益:《东廓先生文集》。
- [17] (明) 罗洪先:《念庵文集》。
- [18] (明) 罗洪先:《念庵罗先生文集》,嘉靖四十二年本。
- [19] (明) 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
- [20] (明) 李涞:《前明李中丞养愚先生文集》,赣州图书馆藏本。
- [21] (清)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文渊阁四库全书存目第171-172册。
- [22] (清) 纪昀等著:《四库全书·中州人物考》[M]北京:中华书局, 1997年。
- [23] (清) 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 1985年。
- [24] (清) 黄宗羲等撰:《宋元学案》。
- [25] 《明水陈先生文集》,江西图书馆藏清抄本。

三、地方志

- [1] (明) 董天赐:《赣州府志》,嘉靖十五年本。
- [2] (明) 余文龙、谢绍等纂修:《赣州府志》,天启元年修,清顺治十七年重刻本。
- [3] (明) 刘节:《南安府志》[M]上海:上海书局,1989年影印版。
- [4] (清) 蔡泰均:《上犹县志》,乾隆十五年本。
- [5] (清)《石城县志》,道光四年刻本。
- [6] (清)(清)魏瀛等修、钟音鸿等纂:《赣州府志》,同治十二年刊本。
- [7] (清)廖鼎璋纂修:《崇义县志》,光绪二十一年刻本。
- [8] (清)黄德溥,崔国榜,褚景昕:同治十一年《赣县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
- [9] (清)石景芬等修:《南安府志》,同治七年本。
- [10] (清)沈恩华等修:《南康县志》,同治十一年本。
- [11] (清)杨锡龄:《道光宁都直隶州志》[M]苏州: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
- [12] (清)刘坤一等修、刘绎等纂:《江西通志》,光绪七年刊本。
- [13] (清)谢旻等修:《江西通志》,雍正十五年刻本。

四、论著论文

- [1]赣州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丹崖悠悠——赣州市赣州通天岩摩崖石刻集锦》[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
- [2]卜正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 [3]田炳文:《佛道秘密宗教与明代社会》[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年。
- [4]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M]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 [5]吴学昭:《吴必与陈寅恪》[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
- [6]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 [7]《明代流民运动——中国被延缓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M]《中国古代史论丛》第2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 [8]吴康:《宋明理学》[M]台北:华国出版社,1995年。
- [9]吴宣德:《江右王门与明代中后期江西教育发展》[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 [10]钱明:《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 [11]曹树基:《中国移民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 [12]黄志繁:《“贼”“民”之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M]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 [13]黄志繁:《在贼与民之间:南赣巡抚与地方盗贼——以王阳明为中心的分析》[J]《中国历史评论》,2002年第4卷。
- [14]黄志繁:《地域社会变革与租佃关系——以16—18世纪赣南山区为中心》[J]《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 [15]黄志繁:《明代赣南的风水、科举与乡村社会“士绅化”》[J]《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
- [16]饶新伟:《明代赣南的移民运动及其分布特征》[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

参考文献

- 3期。
- [17]饶新伟:《生态、族群与阶级——赣南土地革命的历史背景分析》[J]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 [18]饶新伟:《明代赣南的移民运动及其分布特征》[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 [19]饶新伟:《明清时期华南地区乡村聚落的宗族化与军事化——以赣南乡村围寨为中心》[J]《史学月刊》,2003年第12期。
- [20]廖详年:《社会控制视野下的国家、地方、宗族的三重变奏——以明代赣南盐政为中心》[J]《盐业史研究》,2005年第1期。
- [21]李晓方、温小兴:《明清时期赣南客家地区的风水信仰与政府控制》[J]《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 [22]胡成华:《南宋赣南的豪强与地方社会》[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0年第10期。
- [23]李晓方:《明清时期闽粤客家的倒迁与赣南生态环境的控制》[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 [24]李晓方、温小兴:《明清时期闽粤客家的倒迁与政府控制》[M]《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 [25]李晓方:《清中叶赣南的会匪问题与政府控制——以<清实录>为考察中心》[J]《史林》,2008年第4期。
- [26]陶晓蕾、林李楠:《试论佛教中国化后对传统社会的教化作用》[J]《滁州学院学报》,2009年第11卷第4期。
- [27]常华:《佛教的心灵教化功能探析》[J]《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学报》,2009年第9卷第3期。
- [28]谢重光:《宋明理学在客家地区的传播》[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 [29]谢重光:《新民向化——王阳明巡抚南赣对畲民汉化的推动》[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 [30]谢重光:《宋明理学影响下客家妇女生活的演变》[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5期。
- [31]陈进国:《理性的驱驰与义利的兼容——宋明理学与东南家族社会社会经济变迁简论》[J]《东南学术》,2001年第6期。
- [32]程鹏飞:《王阳明“知行合一”与<南赣乡约>》[J]《贵州文史丛刊》,2000年第3期。
- [33]王国荣:《马祖道一传法活动考论》[J]《宗教教学研究》,2006年第02期。
- [34]《北宋虔州、吉州造船业》[J]《文史知识》,2008年第11期。
- [35]周建华:《千古夜话说到今——赣州“苏阳夜话亭”考释》[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 [36]戴显群,王营绪:《正史<隐逸传>反映的隐士隐逸原因及编撰意图》[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5卷第2期。
- [37]江净帆:《“教化”之概念辨析与界定》[J]《社会纵横》,2009年第1期。
- [38]李洵:《试论明代的流民问题》[J]《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3期。
- [39]刘永华:《17至18世纪闽西佃农的抗租——农村社会与乡民文化》[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

参考文献

- [40]周建民:《成雄与成圣——王阳明驯服南赣汀漳业绩另说》[J]《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 [41]周志文:《王阳明在南赣的活动与事功纪实》[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5期
- [42]沈善洪、王凤贤:《论阳明心学及其积极影响》[J]《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
- [43]刘锡涛、肖开铣:《浅谈江西宋代佛教之流布》[J]《井冈山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 [44]张石磊:《宋代隐士及其社会根源浅析——以<宋史·隐逸传>为中心》[J]《才智》,2008年第22期。
- [45]向世山:《从“圆觉经变”石刻造像论宋代四川民间佛教信仰的特征》[J],中华论坛,1995年第1期。
- [46] (英)柯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0年03期。
- [47]柯大卫:《国家与礼仪:宋至清中叶珠江三角洲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 [48]邹春生:《王化和儒化:9—18世纪赣闽粤边区的社会变迁和客家族群文化的形成》[J]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 [49]张映雪:《明代吉安府佛教与士绅》[J]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 [50]崔文彬:《宋代士大夫与佛教》[J]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 [51]江山:《浅论通天岩石窟佛教雕塑艺术》[J]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 [52]吴启琳:《传承与嬗变:明清赣南地方政治秩序与基层行政之演化》[J]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 [53]朱战威:《宋代隐士群体研究》[J]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 [54]巩丽君:《宋代江西佛教与社会》[J]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